

硚口古田地区是武汉市首批老工业基地，建国之初被列为国家 156 项恢复性建设项目之一。1953 年至 1957 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里陆续兴建武汉制药厂、双虎涂料厂、无机盐化工厂、湖北柴油机厂等大批工厂和配套的生活区，逐步完成了工业区布局，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以工业产品为主的工业体系，形成了汉口西部的古田工业群，在武汉工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5 年 4 月，经过 8 年的努力，古田工业区整体搬迁全面完成，成为全国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的成功样本。昨天是今天的记忆，今天也会成为明天的记忆，老照片承载着老城的记忆。



1992 年 10 月，解放大道古田一路武汉制氮厂门前

(摄影 / 撰文 方学鑫)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张智勇 陈胜利
陈红英 林 伟 徐 莉 潘红莲
燕来宾

主 编：阮祥红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 濛

编 辑：章旷怡 刘 玮

封 面 设 计：王 鹏

时代年轮

<<< <

4 武汉三战长江特大洪水 / 吴世伟

11 荆江分洪工程的决策与建设 / 陈松平

风雨同舟

<<< <

17 从文艺情怀到担当意识 / 喻 球

九城同心

<<< <

21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的前前后后 / 刘俊明

委员天地

<<< <

26 助力基层治理，做红色物业的践行者

/ 李 钢（口述） 章旷怡（整理）

30 在政协的跨越、突破与转变 / 丁启瑞

商聚汉皋

<<< <

33 我在靠山小镇当“镇长” / 蒋舒晴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人物春秋



- 36 魏人镜烈士武汉足迹追寻 / 钟 钢
44 博学中学首任华人校长胡儒珍 / 魏志刚 官剑琴

都市史话



- 49 非常时期搅热“冬日马戏场”
——武汉杂技团三次炫技法兰西之二 / 何忠杰

往事漫忆



- 55 《武钢文艺》：六十年的情愫 / 董宏量

史海钩沉



- 59 老汉口的“洋码头” / 李笙清

高校访馆



- 61 地质世界的科普殿堂
——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 / 彭 磊 唐晓玲 徐 燕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武汉三战长江特大洪水

◇ 吴世纬

轮印：1954年，武汉在解放不久堤防薄弱的情况下，遭遇长江特大洪水。全市人民众志成城，紧急实施五期堤防加高培厚工程，配合有计划的分洪举措，确保了江城安然无恙。此后，武汉相继战胜1998、2020年两次长江特大洪水。今天，武汉防汛治水走上人水和谐、绿色发展之路。

1954：水涨堤高

1954年，我还是初中一年级学生。7月，武汉老下雨，而且是大暴雨。一天，雨看似停了，便从家徒步走到武汉关，从运土的竹跳板上一步一步登上大堤，看见堤上人山人海，全都在为堤防加高而紧张忙碌。眺望对岸，江面好宽啊，武昌简直就是漂浮在水上。天，突然阴沉下来，江面马上细雨霏霏，再也看不见对岸。接着起风了，很大，浪花拍打江堤，飞溅到我的脸上，让我不禁打了

一个冷噤。我赶紧从竹跳板快速往下走，突然没来由地摔得生猛，膝盖和手掌都蹭破了皮，以致左膝盖处留下一个伤疤，让我永远记住了“1954年”。但我一点没有想到，我长大后成了一名“老防汛”，一生与防汛治水打交道。

从事防汛治水工作后，我对长江才有了专业上的了解，原来它主要靠降雨形成，属于雨洪河流。

1954年，武汉遇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5、6、7三个月，南北冷暖气流在长江流域交汇滞留，致使水文雨期较历史均位长了近一个月。雨期持续，雨量较大，暴雨集中，成为其显著特点。5月，洞庭、鄱阳两湖地区首先大雨绵绵，随即扩至长江中游一线，先后四次大范围降雨。整个6月几乎无日不雨，7月又暴雨不断。三个月中，武汉地区的总降雨量达到1394.2毫米，较常年多了1.5倍，超过多年的平均年降水量。



江汉关前筑大堤

1954年6月25日，武汉关水位突破26.30米（吴淞高程）警戒水位。7月18日，超过28.28米——这是1931年武汉三镇全部淹没时的最高水位。8月1日至9月8日，高于28.8米的水位持续了39天。8月18日15时，水位达到29.73米，为1865年汉口有长江水位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10月3日，水位才回落到26.30米以下，超警戒水位历时整整100天。

武汉三镇堤防建设始于武昌，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修筑了位于武昌汉阳门与平湖门之间的“花蕊堤”，但据史料记载，仅1870年以来，武汉三镇就遭洪水淹没三次。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市政府开始逐年拨款维修加固三镇堤防。1954年，武汉堤防总长度达到136.39公里，其中汉口58.58公里、武昌49.08公里、汉阳28.73公里。堤顶高程防御，按1931年洪水水位28.28米设计，最高的达到29米左右，但最低的只有26.22米，堤面宽6米左右，堤身单薄，堤基较差，加之许多曾经溃口的堤段隐患甚多，抗洪能力薄弱。

1954年6月23日，面对汛期的严峻形势，中央就武汉防汛工作紧急下达“竭尽全

力，抢救危关”的要求，指定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负责领导。6月27日，武汉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防汛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发布《告全市党员、团员、全市人民书》，成立以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总指挥的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

从6月30日起，市防汛指挥部根据汛情发展，部署实施五期堤防加高加固工程，水涨堤高，确保防汛抗洪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第一期工程6月30日开工，7月10日完工，全市（除汉阳）堤防高程提高到29.5—30.0米，迎战了7月18日出现的28.31米的洪峰水位。同时，经省防汛指挥部部署，先后在禹王宫、洪湖、鲁湖、梁子湖、荆江分洪区采取了分洪措施，减轻了洪峰陡涨对武汉的直接威胁，为武汉堤防加固赢得了宝贵时间。

第二期工程7月19日开工，25日完工，全市堤防高程提高到30.0—30.5米，抵挡了7月30日出现的28.77米的洪峰水位。

第三期工程7月26日开工，8月2日完工，全市堤防高程提高到30.5—30.7米，防御了8月3日出现的28.90米的洪峰水位。

第四期工程8月5日开工，当月中旬完工，全市堤防高程提高到30.7米左右，保证防洪子堤堤顶超江水0.5米以上，经受了8月18日出现的29.73米历史最高洪水位的考验。

第五期工程8月18日开工，9月3日完工，沿堤填实固脚，消除隐患，确保还水期安全。

五期应急抢险加固工程，动用土方327



千军万马战犹酣

万立方米、生石28万立方米、麻袋621万条、草包340万个、芦席83万张、芦柴和高粱秆900多万斤。

1954年气候异常，汛期不仅洪水峰高量大，而且风情强劲频繁。7、8、9三个月中，最大风力不断递增为六级、七级、八级，大风天数长达58天。面对大风掀起的1米多高江涛，市防汛指挥部决定使用木排防浪。从7月21日至9月10日，沿堤布设木排1962块，总长度62.4公里，动用木料5.3万立方米约34万根，动用蔑缆268万米、钢丝绳7.7万米、铁锚6242个。

木排防浪是1954年防汛抗洪的创举，卓有成效。

1954年汛期，全市136公里堤防，发生大小险情21523起，其中重大险情9起。8月10日（水位29.37米）武汉关院墙内外大管涌；8月14日（水位29.57米）汉正街堤塌陷；8月17日（水位29.68米）沿江大道上海路口泵站后墙冒水；8月23日（水位29.63米）额头湾大脱坡；8月24日（水位29.61米）丹水池管涌跌窝；8月13日（水

位29.5米）武庆堤段大脱坡；8月17日（水位29.68米）武泰闸大管涌；8月24日（水位29.61米）武昌万年闸防水墙驳岸倒塌；7月29日（水位28.71米）汉阳武圣街口下水道井口冒水。

1954年汛期，全市29.98万人参加防汛抗洪斗争，驻在堤上的防守人员达17万多人，为战胜洪水而牺牲111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出动11500名指战员，海军派潜水员参加抢险，空军派飞机担负防汛重要物资的运输任务，还从各地调用各类防汛物资和大量抽水机具。水利部派工程技术人员到一线技术指导，各地支援的防汛人员近3万人。

在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面前，武汉人民众志成城，奋力拼搏，在高水位整整维持100天之间，主要堤防没有一处溃缺失防，迎来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

时刻关注武汉抗洪斗争的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欣慰。9月23日，毛主席亲笔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如今，防汛纪念碑在汉口江滩公园高高耸立，记录着武汉人民的英雄壮举。

1954年汛后，经国家批准，武汉市区堤防加固整修，标准定为堤顶高程超过1954年最高洪水位1米。按照这一标准，全市调整城区堤防布局，大力整修水毁险段，逐年加高培厚土堤，并在部分城区建造钢筋砼防水墙，完成土方1442.8万立方米、石方52.9万立方米，新建防水墙18.4公里，浇灌砼8.8万立方米，砌石护坡65万平方米。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市区堤防长度达到

178.5 公里，堤顶高程实现目标要求。

1974 年，按照“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长江防洪方针，国家计委、水电部批准了“武汉市堤防建设规划”，同意武汉市区 178.5 公里长江、汉江干堤按照 1954 年汉江最高水位超高 1.5 米的标准进行加高培厚和改造，并将加固改道工程列入国家计划，每年安排建设资金。

1982 年，国家修定了长江中下游堤防的防洪标准，武汉市区堤防开始按超过 1954 年最高洪水位 2 米的标准加固改造，保证每段堤在堤顶、面宽、堤身边坡等方面全面达到标准。

1998：人在堤在

毛主席在题词中指出“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果然在时隔 44 年的 1998 年，长江流域又发生了一场与 1954 年相当的全流域特大洪水。

1998 年，长江流域气候异常。6 月 11—26 日，强降雨带稳定维持在洞庭湖、鄱阳湖两大水系，历时 16 天。6 月 27 日—7 月 16 日，强降雨带推移到长江上游，历时 20 天。7 月 17 日—31 日，长江中下游进入该年第二降雨期，强降雨带又回到两湖水系，历时 15 天。7 月 20 日—22 日的 48 小时内，武汉市降雨量达 457 毫米，其中最大的一小时降雨量达 102 毫米。

8 月 1 日—29 日，强降雨带再次稳定在长江上游和汉江流域，历时 29 天。8 月上中旬，先后三次出现区间暴雨与上游洪峰叠加的情况，从而加大洪峰水位、流量，造成极为紧急的防汛形势。

8 月 19 日，武汉关洪峰水位达到 29.43 米，仅比 1954 年最高水位低 0.30 米。7 月



抗洪英雄王占成

27 日至 9 月 5 日，武汉关高于 28.80 米的水位维持了 41 天，比 1954 年还多 2 天。汉口站监测的最大 30 天洪量达 1754 亿立方米，比 1954 年的 1730 亿立方米还多 24 亿立方米。

武汉 38 万抗洪大军和上万名解放军指战员，在 800 公里长的堤防战线上奋战 3 个月，加固抢险工程 22 处，处理各类险情 2215 处，战胜长江 8 次洪峰，保住了大武汉，铸就“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

在处理汉口丹水池长江堤段防水墙堤基管涌这一溃口性重大险情时，我们的抗洪英雄——王占成挺身而出。

7 月 30 日上午 10 点左右，武汉关水位 29.06 米，流量每秒 67000 立方米，汉口丹水池（中南石化）出现一处严重管涌险情。管涌口径 30 厘米，高出地面 1 米，江水如漏斗似的流入堤内形成通道。

紧急关头，一位长者手持一根长竹竿，在市领导面前请战：“我是共产党员，中南石化退休干部王占成，我熟悉堤外情况，我个子也高，请求领导批准我跳入江中寻找管涌入口。”

68岁的王占成，从后戗台翻过防水坪跳入江中。江水齐腰，王占成手持长竹竿，脚步慢慢在驳岸压浸台上移动，稍不小心，就有可能陷入涌洞导致生命危险。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正在危急之时，王占成兴奋地报告：“找到了，找到了，我就站在涌洞口的边缘。”

领导、专家迅速拿出了堵口方案。10余名抢险队员相继跳入水中，展开棉被让江水浸透，再给棉被压上石块。在王占成的指挥下，棉被准确地堵住了涌洞口，渗水慢慢由大变小而最后消失。

王占成在江水中生死搏斗两个多小时。再汹涌的洪水也会成为历史，但抗洪英雄与日月同辉，永远把千万人的生命照亮。

实际上，从6月28日武汉关水位进入26.30米警戒水位后，险情不断。30日，汉口龙王庙堤内马路，相继出现裂缝、散浸、管涌各类险情。龙王庙闸口斜对面的万商广场，标高25.79米的1、4、5、6号风道口严重渗水。

7月下旬到8月初，武汉关水位突破28.28米的危险水位后，一路攀升，达到29.20米。市防汛指挥部下达第5号命令，要求各级防指高度警惕，加强重点堤段、薄弱险段的守护。此时，龙王庙险段的堤防全线渗水，凡人行道、人字沟、马路伸缩缝及破损裂缝处，包括大树和电线杆部位都在冒水。外洪渗透“无孔不入”，抢险面积达854.2平方米，交通实行管制。

8月7日，守护龙王庙闸口的工作人员下定决心：“为了决战洪峰，我们必须严防死守，人在堤在，誓与堤闸共存亡。”他们庄严表示：“是共产党员的，我们立军令状，树生死牌，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实际行动实现人在堤在的誓言。”



龙王庙前“生死牌”

16位共产党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市的第一块“生死牌”诞生了。他们团结防守人员百倍警惕，克服困难全力奋战，确保了堤闸的安全度汛。此后，“生死牌”原件由国家博物馆收藏。

1998年，武汉人民艰苦奋斗80多天，战胜长江8次洪峰和汉江历史上最大洪峰，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为了长治久安，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了灾后重建、兴修水利的决策，一场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堤防建设热潮，在武汉长江、汉水沿岸掀起。

11月20日，总投资2.34亿元的龙王庙段综合整治工程动工，并于1999年6月8日完成主体工程，经受了当年7月23日武汉关历史第三高水位28.89米的考验。

1999年，武汉堤防整修加固工程列入国家计划，工程总投资43.1亿元（隐蔽工程9.2亿元，非隐蔽工程33.9亿元），整修加固堤防总长度397公里（一级堤防194公里，二级和三级堤防203公里）。



奋战一线子弟兵

从1999年至2002年底，全市完成长江、汉江堤防加固建设任务，完成土方6131万立方米、砼105万立方米、石方160万立方米。加固堤防397公里，护砌堤外坡318公里，改造防水坪、加固驳岸10公里，新筑6—7米宽的砼或沥青堤顶公路271公里，加固穿堤建筑物179座，堤基处理96公里，水下抛石401万立方米。

2002年6月6日，朱镕基总理视察加固后的武汉堤防，欣慰地说：“长江堤防尽管不是铜墙铁壁，但也稳如泰山。”

2004年，针对市境内受长江洪水威胁的府环河、漫水、倒水、举水的堤防，经多方筹措资金，实施总长度231.23公里的加固整修工程，共投入资金80.66亿元，完成土石方2526万立方米，全面提升了入江支流堤防的防洪能力。

根据长江中下游防洪调度方案，在三峡水库建成投运后，若遇1954年类型的洪水，为控制武汉关水位不超过29.73米的保证水位，武汉附近的几个分蓄洪区还要分蓄洪水54亿立方米。

2020：人水和谐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疫情之中又遭遇长江仅次于1954、1998年的第三次流域性特大洪水。

入汛后，长江先后出现8轮全域性强降雨过程，我市暴雨天气呈现时间长、雨量多、强度猛的特点。6月8日入梅，8月1日出梅，梅雨期长达54天，雨量达956.8毫米（局部地区达1000—1100毫米）。7月5、6日两天，江夏乌龙泉24小时最大降雨量472.3毫米。7月6日凌晨4时至5时，乌龙泉最大小时降雨量为88.3毫米。

大暴雨与长江洪水会师，形成“上泄下顶两边送”的巨大压力。7月12日23时，长江汉口站水位28.77米，流量为每秒61900立方米，超出危险水位（28.28米）21天（7月11日—31日）。中小河流、湖泊、水库水位全线趋紧。在高洪水位下，武汉长江、汉江干堤及连江支堤出现散浸、管涌、滑坡等险情92处。

市区两级紧急投入2.63亿元，用于防汛抢险物资器材。市级抢险救援队伍集结



“江汉朝宗”傲江涛

2100人，开展全场景、全要素培训393次、演练518次，累计参与人员达4.33万人次，各类险情很快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置。

面对疫情、汛情叠加的风险，武汉做到了超前部署、周密准备、强化措施、落实责任，成功应对了8轮强降雨和5次洪峰，实现了全市“江河不决堤、湖库不溃坝、城市不内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不受损失”的目标，在疫情、汛情双向夹击下，取得了防御长江超高大洪水的胜利。

武汉三次战胜长江特大洪水的实践，让我们深化了对长江洪水特征的认识：

一是汛期长。长江洪水发生在5—8月，汉江洪水发生在7—10月，汛期长达6个月。

二是流量大。长江武汉段多年平均年径流量2047亿立方米，最大年径流量10130亿立方米（1954年）。

三是水位高。武汉有水位记载以来的1865年至2020年，武汉关水位超过27米以上达23次，其中1980年以后发生12次，平均约3年发生一次。

四是外洪与内涝同期。长江及其支流的高水位，往往与武汉强降雨集中期重叠，形成外洪内涝。

为此，武汉把握规律，努力朝着“人水和谐”的方向防洪治水，并将长江、汉江堤防和江滩防洪工程，打造为穿过城市中心的两大自然风光轴线。

2000年，龙王庙险段率先变成龙王庙景区，形成“两江交汇、三镇鼎立、两山相对（龟山、蛇山）、两楼相望（黄鹤楼、晴川阁）、两桥相通（长江一桥、晴川桥）、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观。



人水和谐相安然

龙王庙的成功实践打开了眼界，让人们看到了城市防洪工程在改造城市环境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防洪工程与环境整治紧密结合成为共识。

两江交汇是武汉地理环境的独特之处，两江岸线是武汉滨江特色的表现，两岸环境状况如何与城市面貌关联极大。长江南岸从青山武泰闸至武昌八坦路，长江北岸从江岸堤角到沌口江永堤，汉江从舵落口到龙王庙两岸，位于中心城区的两岸线总长约80公里。

2002年以来，按照城市防洪工程与城市环境整治紧密结合的理念，结合堤防加固工程的实施，改造美化长江、汉江岸滩，为市民提供亲水休闲空间。目前，已完成江滩建设70公里，面积740万平方米，既是保卫市区安全的坚固防洪设施，又是武汉滨水特色的靓丽风景线。

今天，幸福的人们徜徉在如诗如画的江滩美景中，往昔管涌崩岸的凶险已经远去，当年鏖战洪水的战场变成了花团锦簇的公园。从此，两江交汇的武汉，不再为水患所困扰，从“人水相争”走向“人水和谐”，与浩浩长江同奏时代新曲。

吴世纬，武汉市水务局原巡视员

荆江分洪工程的决策与建设

◇ 陈松平

轮印：1954年汛期，大武汉告急。关键时刻，建成仅一年多的荆江分洪工程首次开闸，连续泄洪一个月，有效削弱洪峰，延缓洪水涨速，确保了大武汉和江汉平原的安全。

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始建于1952年春末夏初。30万军民以75天的惊人速度，建成第一期主体工程，创造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第一个奇迹。

林一山换下戎装走马上任

1949年夏天，一场大洪水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险些造成荆江大堤决口、长江改

道的毁灭性灾难。这让正在西柏坡思谋如何建设一个崭新中国的党中央，从人民利益出发，重视起长江这个“特殊对手”。

长江洪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据文献记载，从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长江流域发生较大洪灾200多次，平均每10年一次，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其中，1931年死亡14.5万人，1935年死亡14.2万人，1949年死亡5699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制定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时，把长江治理提到重要议事日程。1949年11月，决定成立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司长江流域规划与治理工作，点将四野南下工作团秘书长林一山担任主任。

林一山早年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创建胶东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林一山（右）与肖华（左）在辽南

任辽宁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指挥过千军万马。他以战场指挥员的宏观视野，系统审视长江，在一系列实地调研后，很快将目光聚焦到荆江。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长江自三峡南津关奔涌而出，穿过虎牙山、荆门山夹江对峙的河谷后，从湖北枝城到湖南洞庭湖出口城陵矶，全长423公里的河道通称荆江。荆江下半段地势平缓、河道弯曲，有“九曲回肠”之称。每到夏季，干支流和洞庭湖水系同时涨水，荆江河道宣泄不畅，就会造成严重洪灾。1949年前的300多年间，荆江大堤溃决过34次，两岸流传“荆沙不怕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中”，可见人民受害之深。

荆江两岸，南面是洞庭湖区，北面是江汉平原，系湘鄂两省精华所在，更是“两湖熟、天下足”的国家重要粮棉基地，北岸

大堤一旦溃决，洪水直接淹没江汉平原，进而危及武汉的安全。

荆江河段洪患频仍的根本原因，是上游干流及中游支流洪水汇集量大，中游没有一个容积足够大的调洪、滞洪场所，而荆江河道宣泄能力又不足，这势必造成堤防溃决、洪水漫流而成灾。

毛泽东批准《荆江分洪工程计划》

要从根本上扼控荆江洪患，最有效的措施，当然是在荆江上游、长江的“咽喉”三峡段修筑大型水库。但新中国百废待兴，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技术上，短时间内都不可能兴建这么大体量的工程。

然而，洪水不等人。在根治长江水患的控制性工程建成之前，必须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

明清两代，就有水利学者开展荆江御洪实践——蓄洪垦殖。在重要城市和地区的周边低洼地区，设立一些蓄洪垦殖区，平常年份用来耕种垦殖，遇到大洪水用来分洪蓄水，以减轻防洪压力。这种“利用蓄洪区分蓄超标准洪水，待洪水退后再恢复生产”的过渡性方法，不失为一项迅速、有效、简单、经济的抵御较大洪水之策。

林一山和他新组建的技术团队，借鉴前人“蓄洪垦殖”的经验，在实地查勘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现代工程措施，建设一个可有效吞蓄洪水总量达50多亿立方米的分洪区，用于分泄荆江上游巨大的超额洪水，降低沙市水位，以确保荆江大堤安全，同时减少荆江四口注入洞庭湖的水沙量。也就是通过建设一个大型的分洪工程，为在长江上游兴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赢得时间。他在回忆录里称之为：“以少量而有计划地淹没，



1953年，毛泽东与林一山谈长江治理

避免北岸大范围而无法控制的水灾，简单来说，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向长江水患宣战的第一个战役，也是林一山领导长江委治理长江的第一仗。

戎马生涯十二载，林一山从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早年就读于北师大的经历，又让他相信知识的力量，尊重科学规律。

因此，在扎实开展实地查勘的同时，林一山组织科学论证，租借武汉大学试验场进行模型试验，由曾参与“萨凡奇计划”的留美水利专家杨贤溢领衔，开展了艰苦的水工、土工模型试验和材料试验。从此，一开长江重大水利工程必科学实验之先河。

在林一山的组织和引领下，组建不到半年的长江委编制完成《荆江分洪工程计划》，提出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包括太平口进洪闸（北闸）、虎渡河节制闸（南闸）、荆江大堤加固等项目，总面积921平方公里，有效库容54亿立方米。

在当时，这是一座史无前例的大型水利工程。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在向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呈上了长江委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划》。

毛泽东认真看完这份计划后，递给刘少奇和周恩来，转头问邓子恢：“这个工程能够保用多少年？”

邓子恢早有准备，他已把林一山带到北京，并就有关细节摸过底，马上回答：“可保用40年，至少20年。”

“够了，20年足够了。”毛泽东当即拍板，批准了《荆江分洪工程计划》，并嘱咐尽快付诸实施。

周恩来协调湘鄂两省关系

1951年8月，长江委制定出《荆江分洪工程技术设计草案》。草案本着“蓄泄兼筹、以泄为主”和“江湖两利”的原则，以1931年8月5—25日长江宜昌至枝江段洪峰水位、流量为标准，提出在北岸加固荆江大堤，在南岸藕池口安乡河以北、虎渡河以东地区开辟分洪区。

对此，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顾虑。

荆江分洪区虽在湖北境内，但分洪区蓄满了水，就等于在洞庭湖头上搁了一盆水，万一南岸大堤决口，就要水淹湖南。湖

南方面不由担心：荆江分洪工程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不说，就等于自己淹自己。

湖南方面的担心，也并非毫无来由。历史上，荆江地区早就存在“舍南保北”的做法。最突出的就是明代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大修荆江北堤，把长江通向江汉平原的出口全部封死，让长江洪水通过藕池等口子进入洞庭湖区。

如何处理好两湖的关系，是荆江工程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

早在1950年，周恩来就给邓子恢写信，指出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他特意让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找邓子恢，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初步取得湘鄂相近的看法。

1952年2月，荆江分洪工程会议在京召开，周恩来召集水利部及两湖有关人员来京开会，了解各方意见，商讨对策。根据讨论情况，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在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这个问题上，湖南、湖北两省的意见是一致的。争论的关键，是万一1952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否分洪，如果分洪，如何能免除对湖南的威胁……荆江分洪工程虽在去年10月决定，但今年并不能完成，因之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危险。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

为了使荆江分洪工程更为缜密可行，周恩来又让李葆华和苏联顾问布可夫亲往湖北沙市分洪地区察看。经过实地考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

中央领导周密细致的沟通协调，加之实地考察的科学结论，使得湘鄂两省在荆

江分洪计划上达成了一致，认为其方针是照顾全局，兼顾两省，对两湖人民都是有利的。

随后，周恩来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报送毛泽东审批同意，1952年3月31日正式发布。《决定》明确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

以李先念为首的荆江分洪委员会及工程总指挥部旋即成立。

傅作义带着毛泽东题词慰问工地

1952年4月5日，是一个永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日子。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

毛泽东很关心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作出三点具体指示：一要把荆江分洪工程当作全国的事情来办，全国支援。二是荆江分洪工程关系到两湖人民的生命财产，两湖要全力以赴。三是工程一定要在汛期前完工，调一个兵团用打仗的方法来完成任

务。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来自湘鄂两省的4万名工人、16万名农民，以及10万名解放军官兵和工程技术人员，浩浩荡荡开赴湖北省公安县，投入到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中。

4月29日，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发出《关于完成红五月爱国劳动竞赛总任务的号召》，整个工地迅即掀起施工高潮。

5月20日至24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带着绣有毛泽东和周恩来题词的锦旗，率团到工地慰问。毛泽东的题词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



军民工地奋战热火朝天

恩来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消息传来，工地上一片沸腾，军民受到巨大鼓舞，建设热情更加高涨。

为加快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全国各地都伸来援助之手，各类器材和 30 多万军民的粮食及生活用品，源源不断运往工地。

6 月 20 日，距开工仅仅 75 天，荆江分洪第一期主体工程就胜利建成，比预定计划提前 15 天，速度之快令中外水利界赞叹不已。

第一期主体工程，包括 54 孔、长 1054 米的进洪闸（北闸），32 孔、长 344 米的节制闸（南闸）和总长 208 公里的分洪区围堤。

进洪闸（北闸）是我国第一座大型分洪控制闸，设计流量达到每秒 7000 立方米。这是在平原地区软弱地基上兴建的大规模分洪闸，在国内尚属首次，无经验可资借鉴，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又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文伏波，参与设计的第一座水利工程就是荆江分洪工程。2015 年，笔者陪同长江委主要负责人庆贺文院士 90 华诞时，老人家依然记忆犹新：“我

当时是北闸指挥长任士舜的秘书，长驻北闸施工现场，指导并监督施工方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同时监督和检查北闸的施工质量。”

文伏波介绍，对冲积层沙土软弱地基的处理问题，是北闸设计的难点，解决的方法是，修建钢筋混凝土闸底板，以消除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对水利工程的破坏作用。这是设计原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该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当时苏联都没有。

长江委工程师王咸成经精确计算，提出修正南闸闸底板钢筋布置设计，将钢筋数量由每米 8 根减为 3 根。这一建议，在得到负责设计和施工的总工程师何之泰的同意后实施，不仅加快了工程进度，而且节约了 75 吨钢筋，并确保了工程安全。

工程建设中，涌现出劳动英雄、模范 1.2 万多名，他们中有“父子英雄”“夫妇模范”“兄妹光荣”“师徒双立功”等。

9 月，长江委再接再厉，拟定荆江分洪第二期工程计划。11 月 14 日开始实施，长江委副主任任士舜为总指挥，先后动员荆州、宜昌地区的民工 18.48 万人，于 1953 年 4 月 25 日竣工。



太平口闸启用分洪

经受巨大考验创造奇迹

建设荆江分洪工程的初衷，就是要它担负起保卫荆江大堤、江汉平原和武汉市防洪安全重任，但得靠实践来考察和验证。

谁也没料到，这个考验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

1954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为近百年所罕见。而荆江大堤本身存在大量弱点，抗洪能力较低，一遇长时间暴雨洪水浸泡就险象环生，先后发生脱坡、浑水漏洞、散浸、清水漏洞、冲刷、翻砂鼓水和跌窝等险情2100多处，其中7月21日一天就出险300多处。

形势危急，荆江防汛总指挥部报请批准后，当即启用荆江分洪工程，于7月22日、7月29日、8月1日三次开闸分洪，分泄超额洪水总量达122.6亿立方米，有效降低荆

江河道洪水水位近1米，减少泄入洞庭湖洪水总量总计54亿立方米。

这是荆江分洪工程首次运用，完全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发挥了巨大的防洪保安作用。三次开闸分洪，不仅减轻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的灾害损失，而且使武汉三镇和沿江城乡750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从此，荆江分洪区内产生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分洪保安全，不分洪保丰收。”

荆江分洪工程的迅速建成和有效运用，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依靠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一大奇迹。

陈松平，长江水利水电开发集团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

从文艺情怀到担当意识

◇ 喻 球

人物名片：喻球，致公党湖北省委员会社会发展与服务委员会副主任，致公党武汉市委教科文专委会秘书长；大美湖畔（武汉）文化科技公司执行董事，武汉意品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海联会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武昌区新联会理事、非遗分会常务副会长。

策划专家、诗人、文化学者，在我身上有很多的标签。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后，我一直从事文化创意产业。在大家眼中我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文青”，直到我加入致公党。

我的思想转变了

我是武汉人，在深圳、广州待了十余年，因为负责全国市场拓展，跑遍了大半个中

国，各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深深吸引了我。后来，即便是重新回到江城，“泡馆、逛展、听讲座、看演出”的习惯已经养成。时间长了，我把兴趣爱好晋升成了专业职业。作为一名资深的“斜杠文青”，策展、文创、非遗是我的关键词。写字、表达是我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写着写着字变成了诗歌、书法，说着说着话演绎了故事、传奇。

说起来，入党是一种特殊缘分，有次听朋友介绍统一战线，提到“致力为公，侨海报国”，这句话突然触动了我。进一步了解后，我发现在中国八个民主党派里面，致公党是最早成立的，也是唯一在海外成立的参政党。

在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等革命活动中洪门成员积极参与，宣传革命思想、捐赠革命经费、投身武装起义……它始终是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为推翻封建专制、创建

中华民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由衷地赞叹说：“华侨为革命之母。”

一个党派从立党之初就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并且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这特别了不起，让我不自觉地想要靠近它、加入它。

2018年3月，我如愿正式成为一名致公党党员。随即我参加了致公党武汉市委组织的学习和培训，提升了觉悟，拓宽了眼界，交到了朋友，收获、改变、成长颇多，在这里找到共鸣与乐趣。

我看问题、做事情，跟以前的出发点和角度有了很大转变，提高了政治站位，增强了大局意识，从文艺情怀转变到了责任担当。个人是极其渺小的，就像小水滴，只有放到国家、民族这样一个大海里面去，才能够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

参与建设社区党史馆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党史教育在基层，就是要充分发挥党史展览教育功能，成为共产党员受教育的精神家园，成为引导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基地。

在蔡甸区蔡甸街跃进社区党史馆的建设中，我的内心也非常犹豫。我毕竟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不是中共党员，能否建设好中共党史馆呢？好在街道党工委和社区领导都非常开明，他们鼓励我，不要有顾虑，大胆干、放手干、全力干。期间，我查阅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包括习近平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湖北党史、中国共产党武汉党史等，这些成为展陈内容的重要来源。

跃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是一个像四合院一样的规整院落，里面又分成了很多功能区。社区党史馆在最后一间“红房子”，仅有约80平方米的空间。按社区要求，既要展现中国共产党党史，也要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系列重要论述，以及中共湖北党史、中共武汉党史、蔡甸革命史和建设史等。展陈内容非常多，而现场空间极其有限，还要考虑拓展和更新，这对我们是一个高难度挑战。

于是，我们动了很多心思：将主题墙设置在党史馆的中间区，隔开原本的方正空间，让参观者进入展馆有层层推进的感觉；同时，把展馆主题墙设计成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并且，将数字科技融入其中：在最后一面墙上设置移动电子屏，方便党史资料的延展阅读。

我还提供了党史视频资料，撰写了解说词，安排配音解说，并结合讲解员现场讲解，既丰富了展陈内容和表达，又突破了现有的空间限制。开馆以来，众多党员、干部



蔡甸街跃进社区党史馆

和群众在此参观学习，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打造昙华林近代教育博物馆

我跟昙华林有着特殊的缘分。我在昙华林出生，在这周边长大，对此处一草一木有非常深的感情。昙华林作为武昌古城更新改造的重点区域，在这里建设近代教育博物馆，可以说有着极好的先天条件。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文明印记的重要殿堂，是凝望过去、连接现实、通往未来的桥梁，是城市的历史窗口与文化地标。有特色的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文旅目的地、网红打卡点，更是一座城市的形象窗口、文化IP。我协同团队打造的近代教育博物馆，让文化遗产在活态传承中赓续文脉、绽放光彩，还成为众多年轻人追逐的网红文化地标。

近代教育博物馆位于武昌区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该馆由近代教育陈列展厅、室外连廊文化浮雕墙展区及昙华公书林三个区域组成，收藏了大量关于近代教育的珍贵文物。

明代的石烛台、清代的毛笔、两湖书院刊印的《劝学篇》……丰富的实物展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理念。室外连廊文化浮雕墙展区，首先是一幅昙华林版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呈现了本地百年老建筑群、著名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严昌洪担任学术顾问，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熊召政撰写《昙华林近代教育博物馆赋》，向游客展示了中国



昙华林近代教育博物馆

近代教育发展史的丰富内涵和多元面貌。

此外，“状元及第”的牌匾、明清科举制示意图以及张之洞的教育改革等展区，均备受游客青睐。游客可以在此感受到武汉这座城市近代文化的魅力与历史的厚重。

让非遗“活”起来

非遗是什么？非遗就是生活。非遗文化结合时代元素创新发展，越来越受到市民的喜爱。

2011年，“孟宗哭竹生笋”故事入选第三批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湖北省楹联学会顾问、文史学者吴修志老师，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这位老人家真诚博学、风趣谦和，是“孟宗哭竹生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们因为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史馆而结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考察，他从武昌非遗发展大局出发，改家族传承为师徒传承，我也有幸成为孟宗故事第五代传承人。这些年来，我始终坚持开展学术研究，积极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弘扬、利用，参与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逐



2024年，喻球在洪山一小讲述忠孝门的传奇故事

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认可。

2018年7月，我们筹备、成立了“武昌区昙华非遗文化传承中心”，它是武昌区文化和旅游局主管的一个“非遗高地”。依托昙华林聚集的非遗人、手艺人，举办了“花朝节”“非遗节”“手工艺术展”等大型文化主题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并且被列入“武汉非遗大事记”，这对我们从事非遗传播是极大的鼓舞。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传统，传统文化如何在新时代获得年轻人的认同与喜爱？我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实践，以更精彩的内容、更多元的载体、更丰富的形式，让非遗真正从博物馆、作坊走进学校及街道社区。所谓“见人、见物、见生活”，也就是“活态传承、融合创新”。

我们以人为中心，通过展现“衣、食、香、花、武”等非遗特色，让非遗“活”起来。比如，很多游客都希望吃上地道的湖北美食，我们就集中推出好吃的“非遗楚菜”。在昙华林为游客提供好看的“国风汉服”，供他们拍视频、开直播。

2023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执笔编剧的倡廉情景短剧《凤凰山下》，在昙华林非遗广场首演。该剧以“一线串三珠”之法，将凤凰山及周边的故事串起：一珠为倡廉——中共中央监委蔡以忱烈士后代，传红色基因故事；二珠为孝廉——三国时期吴国司空孟宗哭竹生笋故事，为中国孝文化之血脉；三珠为忠孝——忠孝门（小东门）岳飞的忠、孟宗的孝之轶事，赓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该剧成为武昌古城1800周年的献礼剧目。

2024年，洪山区委统战部组织同心·支教“大师牵小手”公益进校园系列活动，我应邀为洪山一小的同学们讲述武昌忠孝门的传奇故事。我用武汉腔生动讲述，学生们以武汉话积极回应，整个活动现场“汉味”十足。我介绍了三国孟宗少时孝亲、求学进取、为官清廉的人生轨迹，南宋岳飞抗金事迹、两首《满江红》诗词，以及遍布三镇的遗迹和地名等，还带领同学们歌唱武汉童谣……

一座城市的性格养成与城市精神，是从这座城市的历史提炼出来的。武汉的英雄印记，有血脉基因传承。爱国爱家，是这座英雄城市的优良传统。作为一名致公党员，推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开展统战文化的创新实践，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责无旁贷，求无止境。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的前前后后

◇ 刘俊明

湖北考古界四绝：“凤凰擂鼓、盘龙睡虎”，说的是荆州江陵凤凰台西汉古尸、随州擂鼓墩曾侯乙编钟、武汉黄陂商代盘龙城和云梦睡虎地秦墓。睡虎地秦墓在 1975 至 1978 年间被发现并考古发掘，共发现战国末年至西汉初期小型土坑木椁墓 70 余座。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其中 20 余座秦墓，共出土秦代竹简、木牍家信、彩绘漆器及斗兽纹铜镜、陶器等文物 1150 多件。

云梦先后有五批战国秦汉简牍出土，为后世研究秦汉时期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及书法艺术等提供了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极大填补了史书有关秦汉历史的诸多空白，推动了秦汉历史的相关研究。云梦也因此成为海内外从事简牍、秦汉法律史、书法艺术研究的众多学者心

目中的一个文化高地和圣地，同时也赢得了“简牍之乡”的美誉。

农民张泽栋发现睡虎地古墓

云台有地曾睡虎，梦泽无山好腾龙。大泽浩荡八百里，白云悠悠五千年。云梦地名，有 2800 多年的历史；云梦建县，有 1400 多年的历史，是我省著名的千年古县。

1975 年 12 月 26 日，云梦城关西郊睡虎地出土一批震惊中外的秦代简牍，它是由云梦城关镇肖李大队 23 岁的青年农民张泽栋首先发现的。

张泽栋曾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了五六年。据他介绍，1975 年正是全国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那年冬天，云梦



睡虎地秦墓考古挖掘现场

农村已经进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

11月10日下午，肖李大队在云梦火车站铁路西侧开挖排水渠。因为城关周田至肖李三四公里长的地方总淹水，肖李大队一组就负责铁路沿线的中端挖排水沟，长度约五六百米。张泽栋与同村青年张桂林在渠中取土，第四天上午9点多，他发现了青膏泥，这与他1972年参与发掘的云梦大坟头1号墓填土十分相似。

1972年云梦火车站东南约150米处的大坟头古墓开挖时，张泽栋被学校选派去做保卫工作，见到考古专家陈振裕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通过简短交谈、现场观摩、细心了解，他得以掌握一些考古学常识，如：什么是青膏泥，青膏泥下一般有古墓等等。

现在他一锄头下去就发现了青膏泥，抬头一望，发现周边还有10多处长方形青灰色泥土坎，每处相隔3米左右。青黑色的湿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个四方形状，很明显这不是自然造就，而是人工形成的。这应该是用来保护墓葬的青膏泥。难道离大坟头不远的这里又有古墓？

为确定这一重大疑似发现，他便选择一处青膏泥土坎，开挖了一米见方的探坑。在深约30厘米处发现了古墓的木椁，木椁上面还有一层树皮覆盖着，他小心翼翼地沿着四壁又找到了墓圪。他当即确定这个木椁就是一座古墓葬，便迅速将探坑回填。

怎样向上级报告这座古墓的准确地点，这个地点叫什么名字合适呢？小时候张泽栋常去大坟头放牛，因为那里有一个大坟包，高达四五米，后来

通过勘探发现了古墓，省考古队就地取材取名为大坟头。但张泽栋始终认为大坟头古墓群这个名字不合适，一是不雅，二是没有历史性、传奇性，只是一个山地的形状名称而已。

为准确了解新发现古墓地的名称，张泽栋立即跑到附近的蔡陈湾、周田湾打听此地叫什么名字。一位70多岁的蔡姓老人说这里春秋时经常有老虎出没，还有“虎乳子文”的故事流传，但这块地没有具体名字，附近的老百姓都不知道叫啥。

古墓位于云梦楚王城西郊，地处水陆交通要塞，北靠云台，南临梦泽平原，东滨曲阳湖，西扼沮水，坐落在一条山地丘陵伸向平原广泽的大岗脉南端，就像一条巨龙静止在云梦的中心地带。它据岗依水，紧扼“楚东驰道之一站”的咽喉，雄视东面的沮水与南部的广泽平原，又溯沮水北上逐鹿中原，南下气吞云梦据扬越，其地势状似睡虎。

地形像虎，又有“虎乳子文”的故事，何不起名睡虎地，既传奇又有典故。张泽

栋迅速找来民工挖排水沟放线用的干石灰，在铁路边的斜坡地上，用拿手的仿宋体写下“睡虎地”三个醒目大字。

四十多年过去了，张泽栋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他所写的每个字都有现在的A4纸大。用石灰写完睡虎地三个字以后，他就迅速步行四五里路到云梦文化馆，向专职文博干部蔡先启及文化馆长李明生报告了情况。李明生、蔡先启当即同他一起来到现场，经过初步勘察，确定此处为一处古墓地后，迅速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作了汇报。

秦简出土引来举世瞩目

湖北省文化厅获悉后，立即派省博物馆陈振裕、陈恒树两位考古专家到现场进行勘察。陈振裕是福建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陈恒树是武汉人，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他们在新开挖渠道沿线长约30米的一段排水渠内，就发现已暴露出的十二座古墓葬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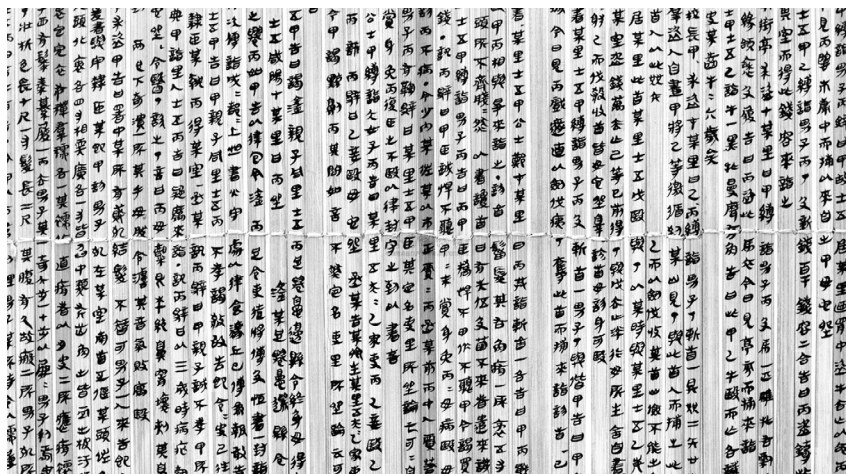
根据省、地、县文化主管部门意见，云梦县委、县政府决定对睡虎地十二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并专门成立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训练班学员系从孝感各县选派，都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男青年。张泽栋也参加了此次培训学习，就连湖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刘玉堂先生也是这期训练班的学员。

训练班特聘两位省博物馆专家为老师，白天在睡虎地发掘现场指导，晚上在云梦县招待所授课。

睡虎地考古发掘队伍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考古训练班学员，一部分是省、地、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云梦宣教系统的机关干部。发掘时分工明确，即由宣传系统干部负责古墓葬上部填土（表土层、五花土层）清运，每座墓葬挖至青膏泥为止；再由省、地、县考古队员负责墓葬地发掘清理及记录工作。

1975年12月25日，考古队开始对睡虎地11号秦墓进行发掘清理。清理盖板时，发现一牛头骨置于盖板中间，牛头四周的角落有焚烧痕迹。专家考证，这应该是古代祭祀时留下的遗迹与遗物。在清理墓葬东壁时发现一壁龕，龕内出土一辆轺车、三件木俑和一匹泥马。陈振裕教授当时与张泽栋开玩笑说：“希望能在此墓出土一车竹简。”

考古工作队在清理椁盖板时，最后一根盖板突然断裂，掉进木椁内，砸断木棺的棺盖板，这时发现室内渗满清水。考古队员用水桶清理椁室内的积水，张泽栋进入墓坑做该墓发掘的“文字、绘图、照相”三大考古记录。一切工作就绪，省博物馆陈恒树进入墓坑清理椁室内的随葬器物。下午



云梦睡虎地秦简

六时左右,11号墓的头箱与边箱内的漆木、铜器、铁器、陶器等随葬器品清理完毕。

天近黄昏,刮起了西北风,飘洒着漫天雪花。这时,墓坑壁龛处突然塌方,塌土将已清理的头箱填满,并损坏到椁室内的木棺。因天色渐晚,天气寒冷,考古队员用竹、木板将棺室盖住后,全部撤离了工作现场。

26日,雪过天晴,但寒气袭人,地面凝结着一层薄冰,墓坑内又浸满了水,水面为薄冰封冻。考古人员都按时进入发掘现场,开始清理11号棺室。他们用水桶将椁室内的浸水排完,然后清除塌陷在头箱内的填土。当时张泽栋已下到椁室底部,在做木椁与棺室的结构等记录工作。

突然,张泽栋在清理所穿胶鞋淤泥时发现两块残竹片,用水一抹,竹片上有字。他迅速递上墓坑请左德承老师辨认,左将竹片在水中清洗,发现有简文,便立即递给陈振裕、陈恒树两位专家。二位专家同时惊呼道:“竹简!”

当天下午三时左右,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挪开棺盖板,一幅惊人的画面显现于眼前:棺内保存一具完整的男性成人骨架,仰身曲肢葬,其头部、右侧、腹部等处,随葬着大批竹简,简文清晰可见。县文化馆馆长李明生立即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万忠恕等领导立刻赶到现场,同专家研究了三条紧急保护措施。

1976年1月19日夜幕降临,睡虎地11号墓的人骨架和竹简覆盖着尼龙薄膜,在省考古专家的指挥下,由8名考古队员托起棺底,运至城里,安全放置在云梦县文化馆图书阅览室。历时49天的睡虎地11号墓的考古、发掘工作,至此圆满结束。

发掘工作从1975年12月1日开始,至翌年1月19日结束,共发掘出秦代木椁

墓12座,出土精美文物370余件。特别是其中11号秦墓内,一具成人骨架的四周摆放着大量竹简的消息,引起轰动。

秦简研究与传播形成热潮

1976年3月,国家文物局决定将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全部调到北京,进行科学的清理与保护。经文物专家鉴定,云梦睡虎地出土的这批竹简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秦代竹简,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状况。

云梦秦简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法律文件:包含《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为了解秦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详实资料。特别是《秦律十八种》,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法典,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法律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文书:包括《为吏之道》《语书》《编年记》等,记录了秦朝时期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官吏的行为规范,为了解当时的行政运作提供了珍贵信息。

医学著作:如《封诊式》,是一部关于医疗程序和治疗方法的书籍,为研究古代中国的医学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占卜书籍:如甲种与乙种《日书》,记录了古人对吉凶时日的预测和解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念和宗教信仰。

云梦秦简的历史价值,在于它们不仅反映了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的书法艺术,更是全面反映了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这批竹简的发现对于填补秦代史料的不足、深入研



1976年，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右一）、张政烺（右二）在北大红楼整理云梦睡虎地秦简

究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一句话，云梦睡虎地秦简让秦代历史“活”了起来！

当月2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报道了云梦出土大批秦简的消息。《人民日报》第六版刊发半个版面报道，标题是“湖北省云梦县发掘十二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出土一批秦代法律文书竹简”，副标题“这是继银雀山竹简、马王堆帛书之后，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又一重大发现”。《人民画报》刊载了出土竹简、文物图片。全国省级以上各大报纸都转载了新华社消息。日本《东京新闻》以显著标题加以报道，并将秦简出土日定为日本国民的秦简纪念日。

1981年，《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平装本、线装本同时出版，云梦秦简的研究与传播在中外骤然兴起。依托云梦秦简，秦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研究成绩尤为卓著，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从1976年至今，世界各国以中、英、日等语种出版的秦简论著多达100余部。云梦这个地域小县，随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闻名世界。

2017年12月10日晚，云梦睡虎地秦简在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重磅推出。睡虎地，这个张泽栋不经意书写的

名字又一次叫响了全国。随后云梦睡虎地秦简入选《国家宝藏》“故宫特展”，其入选词为：“云梦睡虎地秦简，四万多个工整的秦隶汉字，从战国七雄到秦国一统的那个历史瞬间，就被一位普通的小官吏，用最直观的方式保存下来了。”

睡虎地秦简包含着很多缜密细致的法律条文。如关于农业的相关规定，需要向

上级一一奏报；明确规定伐木、采集、捕猎的具体时间以及行为的具体标准；政府统一度量衡的规定；政府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及产品质量检验制度；要求商人明码标价，体现了公平交易的原则，是最早的消费者保护法。

在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秦律到底是怎样的，现存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只有一些不成体系的片段，长期以来人们无法了解其全貌。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正好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其考古文献价值是空前的、无量的。

简牍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翻开简牍，文明的源头有迹可循；拂过简牍，历史的面貌鲜活有趣；临摹简牍，汉字墨色散发浓香。从一枚枚简牍中钩沉千年古县云梦的过往，再现隐藏于古代历史深处的故事。在今人与历史的对话中，守护简牍，传承文明。

刘俊明，云梦政协文史委主任

助力基层治理，做红色物业的践行者

◇ 李 钢（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李钢，市政协委员，民革武汉市青山区工委会副主委，青山区人大代表，青山区工商联兼职副主席，市物业协会副秘书长，武汉嘉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青和居小区视察基层党建工作。作为社区物业的负责人，我向总书记汇报了“红色物业”工作情况，得到总书记的肯定。

总书记的嘱托“要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好”，从那时就成为嘉信物业人的座右铭，印刻在嘉信物业服务的每一个住宅小区服务中心的墙上，激励着嘉信人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联动各方共同为居民群众缔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红色物业的实践之路

上个世纪90年代，我被武汉一家大型国企派驻深圳，感受到改革开放迎面而来的热潮。身边一切新的事物都在激励着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便辞职开始创业，在深圳开了一家手表加工厂。由于经验不足，期待值又过高，结果不怎么如意，就打算回武汉重新开始。

回到武汉后我反思了许久，当时是1996年前后，我发现深圳的物业管理在武汉还是空白，便想在武汉尝试下做物业。当时武汉的房地产还没有起步，更别说物业这一行业了。我喜欢看历史，熟知武汉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山区青和居小区

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 and 工商业基础，武汉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那时候武汉还不能注册物业公司，只能注册清洁公司，我从广州请来三个人，搭建起公司框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地毯清洗、地板打蜡、外墙清洗、擦拭玻璃等。当时我们运用了很多“黑科技”：地毯清洗用的是地毯清洁机；地板打蜡用的是国外进口的水质腊，不用煤油拖；用玻璃水和玻璃刀清洗玻璃，不用报纸擦；用“蜘蛛人”洗外墙，引来好多市民围观，纷纷称奇。

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武汉很多大的单位主动请我们去做物业，公司逐渐发展了起来。1998年，我正式注册创立武汉嘉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武汉最早的一批物业服务企业之一。2015年底，由武汉城建集团开发建设的全市规模最大的公租房小区——青和居小区正式交付使用，嘉信物业有幸承接到该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工作。

青和居是保障低收入群众和无房户有房住、住好房的公租房小区，5000多户居民来自四面八方，生活习惯各不相同，如何

实施高效、精细化的管理，成为嘉信物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当时武汉正积极推行“红色物业”管理，嘉信物业在街道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公司党支部，深入探索“红色物业”管理模式，通过服务创新为业主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服务。

在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下，嘉信倡导“三方联动”工作机制，聚焦居民最为关切、直接、现实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集体协商。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各自独特的优势，形成坚实的治理合力，从而高效解决社区治理中的诸多挑战。

针对毁坏绿地种菜、楼道杂物堆积、楼道里用炭炉生火做饭等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我们和社区及居民携手，共同构建“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机制，将小区内原本裸露的土坡和菜地改造成为“再生花园”，并热诚邀请居民们亲自参与花卉的



总书记的嘱托成为嘉信人的座右铭

种植工作。此举不仅增强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同时逐步培养起居民的自治意识,使“自治”理念深入人心。

为扩大红色物业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延伸物业管理监督的触角,嘉信各住宅项目都广泛聘请“义务质量监督员”,目的就是引导和鼓励居民参与小区的共管共治。通过“义务质量监督员”全视角检查,提出小区物业服务工作的合理建议,跟踪监督整改落实情况,物业公司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居民诉求和小区实际,对相关建议和意见进行分类处理,并逐条加强整改。

比如,此前小区内电动车被推上楼的情况十分普遍,后来“义务质量监督员”提出建议,让保洁做楼层卫生时多留意,发现有电动车停楼道的情况,就通知保安上门劝阻,还专门给小区加装了电动车智能停车棚。现在电动车上楼和飞线充电的情况几乎看不到了,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步伐坚定的革新之路

经过多年探索,“嘉信模式”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发展优势。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的“红色物业”发展之路,同时紧跟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步伐,大胆创新物业服务新模式、新技术、新方式,为共同缔造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不断贡献力量。

近年来,嘉信一直在深入研究业主的潜在需求,勇于自我革新,积极探索创新服务模式,先后推出“阳光透明包干制”“酬金制”等物业管理模式。我们期望通过这些制度革新,从制度层面有效解决居民住宅小区物业矛盾纠纷,突破物业管理中的难

题,为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探索出一条新的有效途径。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接触到江夏区三和光谷道小区。三和光谷道小区自2014年交付以来,投入使用仅3年,门禁系统频繁出现故障、停车位资源紧张、电梯故障导致居民受困等问题凸显,引发大部分业主对原物业公司服务质量的不满。因此,部分业主选择拒缴物业费作为抗议,小区782户住宅和122家商铺,当时物业费缴纳率达不到30%。

但三和光谷道小区里面的业主大多是有学历的年轻人,年轻的业委会成员们决心改变小区物业管理的现状,实行物业管理酬金制。最开始有近10家物业公司被吸引了过来,一听说是酬金制,大部分都打了退堂鼓,只剩三家公司留下来参与竞标,最后是嘉信提出的方案得到业主们的认可,接手了小区管理。

2017年10月,嘉信物业正式进驻三和光谷道小区,引入物业管理酬金制服务模式,在武汉市开创了住宅物业酬金制的先河。这个模式是由业委会成立公共账号收缴和管理物业费,根据物业服务质量,按约定数额提取酬金支付给物业公司,其余全部用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支出,物业则可以将更多精力集中于提升服务品质。

酬金制实行后,小区物业费、停车费以及公共收益部分,全部归入业主委员会统一账户中,并每月公开小区的收支明细,所有费用全部归于居民所有,用于小区公共服务。利用结余资金,嘉信完成对三和光谷道小区内道闸、监控、门禁、水表、路面、绿化等几十项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极大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2019年,小区荣获江夏区物业服务满

意度第一名；2020年，被评为武汉市园林式小区；2021年，住宅物业费收缴率达到100%，成为备受瞩目的网红小区，吸引了众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前来参观学习。如今的三和光谷道小区，环境整洁、车辆有序、邻里间和谐，居民们对此赞不绝口，纷纷表示仿佛住进了一个全新的家园。

嘉信“阳光透明酬金制”的实施，从源头上回应并解决了居民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显著地调和了社区内的矛盾与纷争，成功构建了一个倡导人人参与、人人贡献、人人受益的社区治理交流平台。这种物业管理模式不仅为居民创造了一个和谐且宜居的社区环境，更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一条创新的路径。

共治共享的发展之路

我始终认为，小区内的优美环境和和谐氛围并非单凭社区、物业或居民某一方之力所能达成。只有在党建引领下，坚持群众主体地位，让“群众的事群众商量着办、公开地办、阳光地办”，才能在小区构建出充满“信任”与“温暖”的治理新局面。嘉信积极地推行物业管理酬金制和阳光透明包干制，这既是对公司自身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也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推动物业行业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有力措施。

作为武汉市政协的物业行业代表，我始终秉持着对基层治理模式的深入探索与持续优化的初心，每年所提交的提案均旨在



物业（左二李钢）与居民志愿者一起劳作，共建、共治、共享和谐小区

推动物业行业的创新与进步，以期实现更高效、更科学的行业管理与发展。

在今年的武汉市两会上，我提交了《关于创新酬金制2.0物业服务模式，夯实武汉红色物业基层治理成果的建议》提案，明确提出要确保每位业主对小区相关信息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管权和决策权。物业企业应按照约定收取酬金，为小区提供高质量、标准化的物业服务，让业主的每一笔消费都清晰明了，从而提升小区资金的使用效能，实现业主利益的最大化。

回首来时路，不负新征程。展望未来，我将认真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始终铭记党建引领物业服务创新的初心使命，带领企业立宏志、迈小步、走远路，为湖北省、武汉市经济建设作出“嘉信贡献”，为党建引领社区基层治理贡献“嘉信智慧”，为行业发展贡献“嘉信力量”。

在政协的跨越、突破与转变

◇ 丁启瑞

人物名片：丁启瑞，蔡甸区政协委员，区人民医院工会副主席、三甲创建办副主任、质控统计科副主任。

2021年，我当选为蔡甸区第七届政协委员，至今已有近三年的政协履职经历。回首这三年的时光，我感触最深的是“成长”，是政协启迪着我、引领着我、鞭策着我，在这条为民履职的道路上，我收获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

由专家到杂家的跨越

我是蔡甸区人民医院的一名80后医务工作者，专业背景是药学，2018年在机缘巧合之下，工作从临床转为行政管理。在加

入政协前，我主要专注于医药领域及医院管理等工作，总体考虑层面是在医疗机构执行力上，思考的边界很少跨越自身专业领域。

但政协为不同专业领域的委员们，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成为一名医药卫生界别的委员后，我有幸结识到各级医疗机构不同专业的医务工作人员，我们可以就某一医疗政策分享彼此执行成效，较为便捷地了解行业“风向”，甚至可以大胆地从行业现状反推政策设计的问题，以及执行可能面临的困境。

2022年，在医药卫生界别“书香政协”读书会上，区中医医院儿科主任说到：“最近儿童就诊人数激增，我连续几天都是晚上十点多钟才回家，回家后也是电话不断，人都快扛不住了！”这话迅速引起在座各位委

员的共鸣，大家积极讨论当前儿科医疗资源的短缺及不合理现象，同时预测2023年蔡甸区会面临儿科医疗资源更严重挤兑的“窘境”。

在区政协领导的支持下，我们走访了区卫健局及区内各级医疗机构，以翔实的数据，全面反映了区内儿科医疗资源短缺的现状。由我主笔完成的《关于破解蔡甸区儿科医生短缺的建议》提案在区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被立案，为2023年冬季全区应对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对儿科就诊系统的冲击提供了破解之道，该提案也被评为蔡甸区2023年度优秀提案。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都离不开委员的发言、发声。委员们积极建言、议论风生，是政协一道靓丽的风景。但是，政协的协商议政，不能光说空话、套话、过时话和外行话，建言立论要深刻、专业、精当，一语中的，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真正做到议政议在关键处，建言建在点子上。

在履职初期，限于专业及领域的限制，在面对以现实问题和现实需求为导向的协商议题时，我时常力不从心，现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难以应对复杂的、综合的问题。2022年我第一次参与区政协“推进全区城市五级公园建设”课题调研组，由于专业的跨越以及调研经验不足，迟迟找不到课题切入点。

区政协领导指导我先从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着手，从报告本身挖掘问题，另外从非专业的视角来观察，也许会有不同的思考与想法。随后，我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经几番修订，终于完成人生中第一篇政协调研课题报告。

时过一年后，在参加九三学社武汉市



参加政协武汉市蔡甸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委员会骨干青年第一期特训营培训时，我走访调研了武汉市东西湖区梧桐雨公园设计规划与运营实施，并体验丰富的游园活动。这唤起了我对第一次调研课题报告的反思，再反观当初的课题报告，其实报告中的问题还可以更深刻，建议还可以更丰富具体。

由此，我深刻领悟到，要想见之精，必须识之博，学习永远是政协委员第一要务。而且不应设定边界，“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都要懂得一点，了解一点。我们不一定是个专家，但要努力成为一个杂家，不一定是个专才，但要努力做个“全才”。

从数量到质量的突破

履职3年来，我共撰写区政协提案11篇，被采用7篇。前期撰写提案数量较多，但采用率较低。

记得成为区政协委员第一年，当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我立足岗位，在充分掌握全区分级诊疗和医共体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学习借鉴黄石、宜昌两地区域医共体建设的先进经验，撰写了《关于深化推

进全区医共体建设》提案，提出强化医共体内部制度建设及建立全区医共体内互联互通医疗信息系统等五条建议，充分调动全区“区级—乡街—村级”三级医疗机构医疗力量协同抗疫，有效降低感染者越级就诊，减少交叉感染可能的同时，还可防止区级医疗资源严重挤兑现象。但最终提案未被采纳。

之后有段时间我百思不得其解：自认为提案建议全面、合理，且提案建议在市内其他城区，甚至在许多城市有过成功实践，为什么没被采纳呢？直到在区政协提案办理推进座谈会上，我才了解到，其实有些提案反馈的问题很值得研究解决，但是提案的建议过于笼统且理想化，承办部门难以实施，提案内容最终也只能沦为“空谈”。

于是第二年，我在充分调研，征求相关部门建议后，调整建议思路方向，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建议重新修订了《关于加快医共体建设，提高全区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提案，顺利被区政协采纳并评为优秀提案。这次成功“逆袭”也让我深刻明白，政协委员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也应该脚踏实地！提案建议不仅要科学合理，同时还要具备可行性与操作性，这样才能推动提案建议的落地生根。

由忐忑到坦然的转变

近些年，我通过提案或社情民意参政议政过程中，时常会有一些具体建议与承办单位领导意愿相左，甚至被指责，说我们老挑毛病、找岔子，没有大局观等等。起初，自己还心存芥蒂，对政协履职初衷一度彷徨，发言时有所顾忌，顾及身份不敢说，敏感话题不敢说，领导在场不敢说。

此时，区政协一位领导的话打消了我的顾虑。他说，政协就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

表达各种诉求的交流平台，我们允许发出不同声音，若没有不同声音存在就不叫政协。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古语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多一些声音、多一些观点并非坏事，这正是代表社会在进步。尤其是一些事关区域发展长远和全局性的大事，在决策前思想高度统一，言论高度一致，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在这位领导的鼓励支持下，我又重新燃起说“不”的勇气。

在后期参政议政中，我一方面积极调整心态，反映问题力求客观公正，出于公心，不掺杂个人主观偏见，不意气用事。在针砭时弊时再增添一些人文情怀与格局，在保证所建之言可资可鉴，所献之策可行可用的前提下，偏向以更有“情感”、更有“温度”的方式表达出来，朝着“言之成理、持之有据、闻之悦耳、思之警心”那种新高度努力。

另一方面，在行文架构上，提出问题简明扼要，直击重点，同时更加注重建议的比重。指出某些单位部门工作差距与不足不是目的，而是和他们一起想办法、谋出路，提出富有建设性且可操作的意见建议。这就要求我们政协委员多走访调研，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参政议政有事实、有分析、有论证、有建议，能以理服人。

一路走来，是政协让我使命感、责任感倍增，是政协使我坚定理想信念，是政协引领我成长。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将时刻牢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与使命，为促进武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武汉实践添活力、聚合力！

我在靠山小镇当“镇长”

◇ 蒋舒晴

人物名片：蒋舒晴，武汉孝感商会秘书长，武汉德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晴书屋创办人，新洲区政协委员，武汉市工商联执委。

屋内是淡墨书香，屋外是山水风光，这方惬意的农村书屋位于新洲区仓埠街靠山小镇。这是一座绿色、年轻、时尚的小镇，高雅别致的徽派建筑、曲径通幽的乡村小道、古色古香的民宿相映成趣，既充满了浓郁的江南风情，又有徽派建筑之美，打卡其中，充满诗情画意。在这里，大家亲切地打趣我为“蒋镇长”，我也乐在其中。

梦想萌芽：那是来自成长的感悟

我们离开故乡是为了去看世界，看过世界之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故乡。我出生在大

悟县的大山深处，伴随着稻谷蛙鸣长大，19岁来到武汉，经营过服装生意，后做起了药品代理。随着行业的变革，利润越来越薄，我开始寻求其他出路。

在早期的经营过程中，我逼着自己不断奔跑，好像只要一慢下来，就会和整个世界脱节。我时常因为文化底蕴的不足而感到吃力，因此我积极阅读，努力从书本中汲取更多的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在沉浸书本、点亮自己的过程中，我也萌发了一个梦想——带动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梦想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我的内心深处闪耀着温暖而坚定的光芒。

当我遇到商会，得到各位商会企业家的认可和支持后，我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找到了一个载体和路径——办书院。

我梦想中的书院，有着古朴的木质书架，一列列整齐排列着，承载着古今中外的



俯瞰山水田园中的小镇

智慧结晶。从经典文学到前沿科技，从哲学思考到生活艺术，每一本书都像是一位沉默的智者，等待着与读者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

梦想开花：那是源于情怀的驱动

2014年，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古琴台月湖风景区创办了琴台书院。主要是开展教育培训和传统文化推广方面的工作，通过读书、讲座等方式为企业家们提供信息交流、业务拓展的平台，赢得诸多赞誉。

2017年，我偶然了解到政府在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武汉当时正在创新实施“三乡工程”，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本来不得其门的我，恰巧认识了新洲区仓埠街靠山小镇田园综合体靠山小镇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一席谈话后，我们一拍即合，他代表靠山小镇邀请我参与运作，我欣然应允。

仓埠街位于新洲区西北部，是新洲老三镇之一。靠山小镇位于仓埠街北段，东侧紧邻230国道，109省道、318国道从小镇内纵横而过，距武汉市中心城区约50公里，

车程仅45分钟，区位优势显著。

初来小镇，蓝天白云下羊肠小路，老农牵着牛儿慢悠悠散步，水田里几只白鹭低头觅食，傍晚的余晖下蛙鸣不断，类似我的家乡大悟县蒋家楼白云山。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来到靠山小镇后，我的节奏彻底慢了下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静下来思考。靠山小镇是独特的，具有“花香水韵，人文古镇”资源禀赋。我十分珍惜这块宝地，

坚定地要把它打造为长江新区生态客厅，引领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区。

梦想结果：那是奋力拼搏的收获

在靠山小镇工作一年多以后，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这块热土。当时基础建设已经完工，部分项目也已入驻，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传统文化一时却看不到传承和发扬的机会，而农民本来贫瘠的文化生活也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善。这就让一直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我，心里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思虑良久，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在靠山小镇办一个农家书屋！于是，我取出所有的积蓄，加上私人拆借、银行贷款、股权融资等，凑了1000多万元，带着上万册图书来到项山村，耗时近三年，开了一间集书屋、民宿、餐饮、采摘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打造了“晴书屋”品牌。

这个田园综合体主要包括晴书屋、晴民宿、晴农场三个部分，采取以“乡村书屋

+ 乡村民宿 + 共享农场”的模式，融贯当地特色文化，深耕乡村文化传播，拓展文化创意产业，进而探索乡村文化和产业振兴的具体实施路径，为“靠山小镇”乡村振兴的推进提供了有效助力。

晴书屋由两座庭院构建而成，2021年6月开始投入使用。配备功能有藏书阁、禅茶室、书法室、乡村教室和美食餐厅。晴民宿，利用村里闲置的宅基地，建有民宿18间，2021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晴农场是在晴书屋周边流转近百亩土地打造而成，结合晴书屋、晴民宿，为下乡市民提供一站式农事服务体验。

梦想发光：那是义不容辞的担当

晴书屋是以会员制为运营基础的“聚贤”平台。以书为媒介，以晴书会为组织形式，实行会员注册，建设私域流量池，形成一套可复制推广的乡村书屋经营模式。

目前，在社会各界的捐赠和帮助下，“晴书屋”藏书阁拥有藏书一万余册，品类丰富；提供茶歇服务，是广大城乡居民“充电”、休闲的理想去处。墨韵斋文房四宝俱全，书画爱好者可在此交流技艺。多媒体教室设有电脑、音响、投影和白板等设备，可容纳百人同时开展培训学习。

开业至今，书屋完全免费为村民开放，目前共举办了100余场活动，受益人数过万。书屋每周举办乡村读书、文化交流活动，每月邀请社会不同行业的大咖到书屋乡村课堂为村民授课、举办文化沙龙、交流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经济发展搭建对接的平台。通过组织村民开展实用技术方面的针对性培训，晴书屋及时解决了村民生产生活上的一些难题。

项山村有个村民周坤福，在家养殖小龙虾，经常到农家书屋借阅关于养殖方面的书籍，自学掌握养殖技术知识，农家书屋成为了他自主创业的“加油站”。通过养殖小龙虾，他每年毛收入能达到七八万元。他的妻子甘淑兰在万千花境项山园区务工，因为经常阅读苗木种植方面书籍，成了村里苗木种植方面的土专家，每月工资能达到3000元。

作为一名区政协委员，我始终以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饱满的履职热情，当好党政决策的“宣传员”、社情民意的“调研员”、基层群众的“服务员”，用务实作为展现政协人的风采。近几年，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特长，撰写一批高质量的提案。

其中《凝聚品牌共识，做强农业精品》提案，针对我区农业发展的现状，提出凝聚品牌共识的建议，旨在通过品牌化运作，提升我区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进标准化建设，提升农业品牌品质》提案，强调标准化对农业品牌品质提升的重要性，建议建立健全农业标准化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增强市场信任度；《关于发展乡村民宿，打造精品休闲游的建议》提案，基于我区乡村旅游资源，提出发展乡村民宿的建议，打造高品质的休闲旅游项目，促进乡村经济振兴。

同时，我也十分注重履行委员社会责任，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助企纾困、志愿服务等活动。

“蒋镇长”是种调侃，更多的是份信任。我将利用自身的经验、信息、平台等优势，多办利民之事，多建惠民之功，帮助基层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魏人镜烈士武汉足迹追寻

◇ 钟 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次年7月，私立武昌荆南中学16岁的学生魏人镜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1928年3月，魏人镜壮烈牺牲，时任湖北省委书记。

22年风雨人生，6年革命生涯。魏人镜烈士如一颗流星划过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上空。2021年，我受汉川市委《魏人镜传》编纂委员会之邀，撰写《魏人镜传》。三年埋首，数易其稿，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付梓，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陈潭秋介绍入党

1906年3月8日，魏人镜出生在湖北汉川县丁家集魏家湾，兄弟四人，排行第三。祖辈以种田为生，“修德崇礼，耕读传家”却是家训。父亲魏天叙是一名秀才，以教书为业兼研医术，人到中年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抱负，转行开医馆，拯救天下苍生。这些，深刻影响了魏人镜日后的成长。

1922年春节过后，魏人镜在大哥魏玉

泉的资助下来到武昌求学。首先考入武昌荆南中学，一年之后因革命工作需要和家庭经济压力，考取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立一师）。我在查阅资料时，却发现有不同记载。《孝感英烈》（第一集）（孝感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孝感地区行政公署民政局1984年5月编）《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写道：“一九二二年春，人镜远离家乡来到武汉，考入武昌共进中学。秋季，又考入湖北一师，这年，人镜十六岁了。”文章来源是汉川县党史办，按说较权威。可是，魏人镜烈士的侄儿魏文洲在《党史天地》2006年第7、8期连载的《为革命献身的年轻湖北省委书记——魏人镜》中说的是“武昌荆南中学。”

武昌共进中学由钱介磐（亦石）等人创办，1921年秋成立，校址在武昌中和门附近的豌豆湖边，1922年春季迁至中和门后街。武昌荆南中学，1912年由荆州府所属枝江、宜都等7县旅省同仁筹办，建在湖北牙厘总局旧址上，背靠胭脂山，紧临巡抚署。两校相隔很远，并不容易混淆。



魏人镜学生时代

1980年，魏玉泉向湖北省博物馆捐献了魏人镜的遗物、遗稿等。此外，还有魏玉泉抄录的家书、整理的《魏人镜烈士光辉典范》等。查到魏玉泉的回忆文字说：“魏人镜考取武昌荆南中学。”

那么，考取武昌共进中学又是从何而来？细查，发现魏人镜留下的作文《言志》注明：“壬戌年（即1922年）试共进中学国文题。”很明显，这是为考学做的题，易误看为共进中学的作业，于是有了考入该校一说。

在武昌荆南中学时，魏人镜课余常去邻近的武汉中学参加读书活动。在陈潭秋的指导下阅读《共产党宣言》，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利用空闲和假期，到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武昌第一纱厂平民夜校上文化课，讲述反对压迫和剥削的道理，深受工人喜爱。《中共孝感简史1919.5—2000.12》（中共孝感市委党史办公室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7页记述：“魏人镜（1924年秋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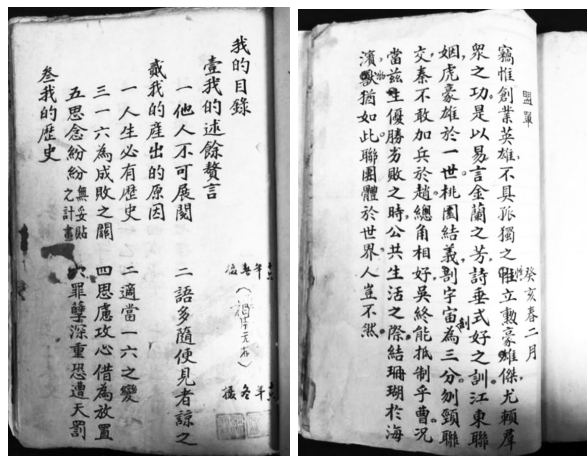
《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写道：

“一九二四年，他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参加社会活动时，认识了中共武汉区委负责人陈潭秋。经陈潭秋同志介绍，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革命献身的年轻湖北省委书记——魏人镜》一文说：“（1922年）4月，由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地委组织委员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同表述还有几种，看似都有一定可信度，然而，此情就说明有问题。经继续走访专家和查阅资料，终于确定魏人镜入党的准确时间。

据《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56、57页记载：“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1921年）至迟明年7月前发展党员至30人……在武汉地区，通过区委的培养教育，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分子和工人运动骨干分子项德隆（项英）、林育南、何恐、李求实、刘光国、施洋、林祥谦、陈天、张绍康、陆沉（卢斌）、林毓英（张浩）、魏人镜、梅东洋、马念一（马



魏人镜《十六自述》目录和魏人镜撰写的《盟单》

哲民)、许鸿(许凌青)、李之龙、廖乾吾、唐际盛、陈上东、王幼安、张其雄、董贤珏等先后入党。”

1922年7月16日,党的二大召开之前,全国只有195名党员。魏人镜成为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同时也是汉川最早的党员。

17岁领导学生运动

1923年春季,魏人镜考取省立一师。他和陈定一、戴克敏倡议成立“学术结盟社”,并撰写了《盟单》(结盟的誓词),把同学们组织起来,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进步刊物,开展进步活动。后来,董必武将之改为“觉社”,明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要进行以阅读进步书籍为基本活动内容的工作,团结进步青年,发展党团员,为革命蓄积力量,使之成为了在武汉有广泛影响的学生社团。

4月上旬,陈潭秋、董必武在省立一师谋划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由魏人镜负责发动学生。他立即找到陈定一、戴克敏和高一年级的同乡同学王平章、何定仁、李良才及外县同学尹成章、杨翼衡等,在本校或者利用老乡关系在其他学校动员学生。

4月12日中午12时,由中共武汉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区委发起的武汉国民大会,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举行。武汉37所大中学校师生员工、46个团体各界人士约5万人与会。强烈要求“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提出“收回旅大”“抵制日货”“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一致决议成立武汉外交委员会,通电各省呼吁组织国民外交委员会,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浪潮,呼应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人民的反帝爱国活动。魏人镜和同学们群情激昂参加大会和空前的反



魏人镜保存的省立一师同学录有关内页

日示威游行。他和陈定一等手挽手走在省立一师队伍前头。

7月中旬,经省立一师选派、武汉区委同意,魏人镜作为教练助手,随省立一师童子军代表队赴湖南长沙,参加全国童子军暑期大会操。该队取得优良成绩。

魏人镜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总结了武汉三镇童子军建设的不足。武汉区委对此很重视,让他在推广省立一师童子军做法时,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等观念,巧妙地融入进去。8、9月间,魏人镜在受邀为兄弟学校辅导童子军建设中,向学生传播革命道理。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第85页记载:“1923年6月……。10月,为推进湖北整理党务和工会工作,中央又派包惠僧接任武汉区委委员长,对区委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以董必武、刘伯垂、廖乾吾、魏人镜为委员,许白昊任秘书长……”

魏人镜作为区委委员,负责领导学生运动和团的工作,公开身份是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这一年,17岁的他进入区委领导班子,表明党组织不拘一格培养青年干部和他的才干出类拔萃。

1924年3月底,魏人镜等6名学生将



魏人镜诗作

军阀萧耀南的罪状印制成传单，混入萧耀南举办 50 大寿宴席的酒店散发。夏季，魏人镜协助陈潭秋调研全省国民党人员基本情况，为党召开四大确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扩大左派，批评和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工作方针提供依据。9 月 3 日，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成立，魏人镜当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他把学生团体和各界人士联络在一起，扩大了学潮威力。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魏人镜根据党组织指示，6 月 2 日领导省立一师学生率先罢课游行，10 余所学校纷纷上街响应。

1926 年 6 月，魏人镜任《楚光日报》编辑，主编每周一期“画刊”，自己还创作漫画和撰写文章。因为内容丰富，群众喜欢，每逢出版，要增印几千份。《楚光日报》是党领导的最早日报之一，在革命斗争史和革命报刊史上都留下光辉一页。

配合北伐军攻占武昌

1926 年 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中共湖北地委对接应北伐军作了具体分工。魏人镜、蔡以忱、陈定一、袁溥之等留在武

昌城内，在陈潭秋直接领导下，瓦解军阀部队军心、策反守军做内应，发动民众配合北伐军进城。

魏人镜住在武昌花园山双柏庙街（今双柏街）一家客栈。陈潭秋住在都府堤 20 号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内，他俩与陈定一隔几天碰一次头，地点由前一次见面时约定。

8 月 13 日，由于反动分子向湖北军务督理陈嘉谟告密，陈定一被捕，他是中共党员，又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魏人镜从陈潭秋处得知消息后，立即按要求去地委机关所在地啸楼巷 5 号，销毁无价值的材料，把重要文件等送到陈潭秋家里。

8 月 27 日晚，陈定一壮烈牺牲于武昌火巷口（今大成路口），军阀竟将他的头颅悬挂在省公署门前电杆上示众。28 日，魏人镜在人群中望着同窗、战友身首两处，强忍悲伤，更添仇恨。

次日上午，魏人镜逆风而行，将生死置之度外，头戴大草帽上了花园山，趁天主教堂弥撒散场后，将《北伐之重大意义》《拥护北伐之宣传大纲》《吴佩孚罪恶及其命运》《欢迎国民革命军及保障人民利益宣言》等传单撒向众信徒，借此发出怒吼：“打倒军阀陈嘉谟，北伐革命成功，北伐军必胜！”然后冲下坡去，走昙华林，攀凤凰山，瞬间就消失了。

8 月 31 日晚，武昌城门全部关闭。9 月 3 日凌晨，北伐军向武昌城发起第一次大规模冲锋未果。5 日凌晨，第二次全面攻坚战受阻。8 日，再度发起攀城战仍未成功。9 日，北伐军遂对武昌城实施水、陆和通讯等全面封锁围困。

在围城的 40 天里，魏人镜住处遭北洋

军士兵多次搜查，稍为值钱的衣物和储存的粮食均被抢走，靠蚕豆和马齿苋等野菜度日。白色恐怖笼罩，他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关系，利用《楚光日报》记者身份，以采访名义接触第一师师长宋大霈，向他透露解围援军难以到达、北伐军在武昌外围取得战绩、北伐军友好对待他住在汉口的家属、他的上司陈嘉谟、刘玉春派代表与北伐军接洽接受改编等情况，并为之分析形势，影响了其政治态度。

董必武领导的湖北特种委员会据此及综合各方情况，组成策反宋大霈专班，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梁钟汉具体负责。国民党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通过老关系对宋大霈表示诚意。9月下旬，宋大霈派代表与刘伯垂、梁钟汉接洽，表示愿做内应并接受北伐军改编。邓演达指定宋大霈师为北伐军攻城别动队，任命梁钟汉为该队总指挥，宋大霈协助。10月10日，北伐军对武昌城发起总攻，宋大霈在文昌门打开城门，率部起义。

至暗时刻出任省委书记

魏人镜从武昌出城后，暂住汉口《楚光日报》社休养，接着就忙开了区委机关工作，会议都由他安排，文件都由他起草、刻录、印发。

此前的8月下旬，为了适应北伐战争需要，有效推进革命运动，根据中央会议精神，湖北地委改组为湖北区委。《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 1919.5—1949.10》第123页记载：“1926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彭泽湘来武汉，将中共湖北地委改组为湖北区委，彭泽湘为书记，陈潭秋、蔡以忱、向忠发、陈荫林、魏人镜、董必武、钱介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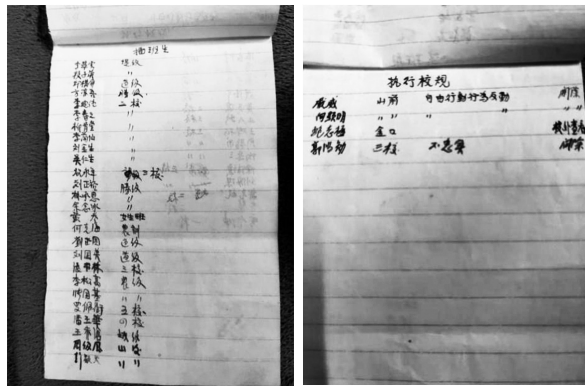
刘伯垂等为委员。”魏人镜还任区委秘书。

从10月至年底，短短3个月，魏人镜经历了彭泽湘、李立三、张国焘三任湖北区委书记。他们的出生、教育程度和经历不同，性格各异。魏人镜凭借高度的政治觉悟，超强的业务能力，既当好领导助手，又全面服务领导集体。

11月3日，第10期《中央政治通讯》刊登魏人镜所撰的《中共湖北区委书记政治报告》《中共湖北区委对湖北目前几个重要政治问题的意见》，后者成为指导当时湖北一段时期工作的基本方针。11月20日，国民党省党部以“意见”为基础增添一些内容，发表了《湖北目前最低限度政纲》。李立三后来发表的《武昌善后问题》中要解决的12个方面问题，也是以“意见”为蓝本完善而成。

那一段时间，魏人镜还在董必武领导下，参与创办《汉口民国日报》和区委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筹建两湖党校。

11月，魏人镜协助毛泽民在汉口开办长江书店及长江印刷厂。1927年4月中旬，他参与毛泽东《湖南农民革命（一）》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印单行本的校对工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长江书店



魏人镜保存的培训班学员和处理违纪者名单

出版发行,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而重大影响。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魏人镜参加大会,并在大会秘书处做了大量会务工作。

5月中旬,中央决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改为湖北省执行委员会,由张太雷任书记、陈潭秋任组织部主任、魏人镜为委员兼组织部秘书。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在武汉的中共临时中央紧急决定,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魏人镜提前对通往江西的鄂城、大冶等县的县长作考察。果断派进步人士吴炽夫任大冶县政府秘书,专行“接送权”,保证了贺龙、叶挺的国民革命军队伍过境。

8月2日,在武汉地区党组织统一部署下,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爆发。这天早晨,魏人镜到汉阳兵工厂指挥。全厂罢工至8月15日,期间无武器出厂,直接支援了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后,魏人镜深入工厂等传达会议精神,在纱厂、水厂和各个码头,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党支部、党小组。有一次,他摆脱暗探追踪,在汉口观音阁育婴巷敬节堂秘密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妻子担忧他的安全,他说:“性命抱紧了,革命就不能成功。”

11月初,魏人镜受省委指派到黄安,向黄麻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传达省委四条命令:“1.利用任应歧与魏益三之冲突,扩大黄安农民暴动范围至麻城一带。2.建立工农士兵代表会议政权。3.组织正式工农革命军。4.发展党组织。”

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14日凌晨,起义军攻占黄安城。18日,成立黄安县农

武鄂

第	分校第	52	月份	学	费	报告表	No.
No.	姓名	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结余	本月合计	备注	页
1	魏人镜	6.0	1.0	5.0			
2	王德						
3	朱子大	3.0	0.6	2.4			
4	魏时						
5	何光	1.5	0.8	0.7			
6	傅九	9.0	8.0	1.0			
7	王德				18.0元		
8	熊文				18.0元		
9	李德						
10	魏人镜						
(以上以厚计算)					总共实收	12元3角0分	
					钱	900元	

魏人镜保存的党费登记表

民政府。《湖北英烈传·第三集》(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湖北省民政厅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魏人镜》一文记述:“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取得胜利后,为了巩固和扩大暴动成果,湖北省委派魏人镜前去巡视工作。魏人镜到黄安(今红安)后,传达了省委指示,立即将黄安、麻城两支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是湖北省最早建立起来的由我党领导的正规人民军队。”

1928年在血雨腥风中到来。由于武昌市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湖北省委决定成立武昌市临时委员会。“魏人镜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武昌临时市委书记(1月至2月),2月至3月担任中共湖北省武昌县委员会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320-321页)。

魏人镜克服重重困难,找到失散党员150余名。在城区恢复和建立7个党支部,在农村恢复山坡(保福祠)、土地堂2个党支部。武昌基层党组织得以初步复元。

2月18日,湖北省委设在汉口豫泰旅馆(裕泰客栈)、小董家巷、慈德里和武昌保安门等处的秘密联络机关被敌侦破。短短

几天，包括省委委员王达祥（亦称王达强）近 50 名共产党人牺牲，许多人被捕，一些负责人撤出武汉。不久，省委书记刘伯庄、常委余茂怀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省委几近瘫痪。

“省委在汉口、武昌的秘密机关连续遭到破坏。在斗争极端尖锐复杂的紧急关头，魏人镜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中共武昌市（县）委书记，化名王凯”（《为革命献身的年轻湖北省委书记——魏人镜》）。遗憾的是，目前没有找到有关魏人镜的任命文件，也许是紧急时刻的一种口头任命或者先任命后下文，还未及行文他就牺牲了。这些，有待于继续挖掘研究。

至暗时刻，魏人镜当上省委书记。他苦撑危局，将省委机关秘密转移到豹子邂，随时准备战斗。

湖北全省清乡督办公署稽查队，侦知中共党组织仍在豹子邂活动，3月12日、14日两次出动大批军警，以抓土匪为名大肆搜捕，分别在县委办公处、秘书处抓捕7人和5人。魏人镜在后一次中被捕，经叛徒暗中指点，省委书记身份暴露。“督办公署”军法处处长余庭襄亲自审讯，对他百般诱降不成后又严刑拷打。

魏人镜始终坚贞不屈，3月17日和4位志士在武昌武胜门外螃蟹岬刑场英勇就义。他的堂兄魏运林在整理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留下的千古绝唱：

夜台犹有钢筋骨，地下更加奋斗争。

寄语党中诸勇士，砍头枪毙莫灰心！

这首诗其余的诗句因纸被掐烂，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尽管残损不全，然而震撼人心。夜台，指坟墓，借指阴间。死又如何？他们仍然是钢筋铁骨铸就的革命者，即使化作鬼魂也要继续为理想而奋斗。这是多么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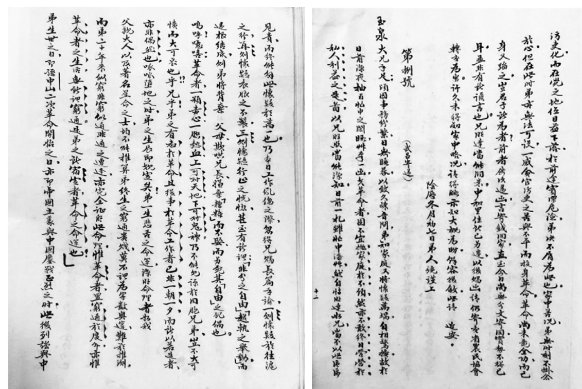
锵有力的誓言，以不怕牺牲的精神鼓励战友们：拿出革命勇士的气概，坚定信心，前赴后继，夺取胜利！

远在莫斯科的董必武得知魏人镜牺牲的噩耗，用隐语给魏玉泉写了一封信：“家乡情况，余全知悉。如谓‘人尽其才’，卓越可嘉，忠毅可贵。不幸二竖为患，夭折可惜，家中损失大为可叹。勿过于伤痛，以家务为重。葳。”信中“人尽”即人镜；“二竖”指胡宗铎、陶钧，分别为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副司令；“葳”是董用威三字缩写，即董必武。

珍贵的 12 封家书

1926年10月11日到1927年2月13日，魏人镜在繁忙的革命工作间隙，给大哥魏玉泉写了12封信，平均10天一封，共约1.5万字。信中既有对父母的感恩、对亲人的挂念、对婚事的态度和对做人准则的思考，又有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对参加革命的目的阐述、为国家前途的担忧及研究经济的愿望。

一年多之后，魏人镜牺牲，魏家遭到迫害。魏玉泉怕这些信被反动派抄走，便抄录下来依次编号，注明发信地点，四处藏匿。由于多次转移，原件未能保住，抄录件保存



魏人镜第 8 封家书（魏玉泉抄录）

到新中国成立，1980年代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尤其第8封信，4500字，充满了一位年轻革命者的思想光辉。全信分7个部分。首先，表明革命者不是抛家者，但亦不能终日只顾私人利益。其次，阐述自己为什么要成为一名革命者，是自己的命运使然。自出生时，适逢革命年代；具体到出生地汉川贫富悬殊，属革命之乡；魏家大家庭困苦甚焉，乃革命之家族；所到之处，均为革命环境。第三，对革命目标的理解十分明了：解己痛苦，解人类压迫。第四，论述革命的真义不是升官发财。第五，摆事实，讲道理，回答三项疑问。第六，革命者如何正确处理革命事业与家庭婚姻的问题。讲了四点：一是革命者的使命感；二是革命者的牺牲精神；三是革命者在婚事上也应开风气之先；四是以革命为职志，节俭办婚事。第七，表明自己要提高革命理论水平，增强建设之能力，坚定革命不动摇。

这封信讲述了魏人镜对革命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潜心探索的过程。他深感革命意义至为广泛，而革命事业亦最有价值。革命目的和任务，就是要拯救社会一切被压迫者。革命者应牺牲一切利益完成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生命。他体会到革命和建设不能截然分开，建设应包括在革命之中。他痛恨一切官僚恶习和任人唯亲的弊政，批判有人对革命的种种诬蔑和把革命当作投机事业。他不为高官厚禄所驱使，婉拒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任他去某县和某军做官。他一心致力于干实事和党的理论研究。整封信说理透彻，振聋发聩；慷慨激昂，气势磅礴。

这12封家书，字里行间洋溢着魏人镜的革命信仰、远大理想；多侧面反映了他的

心路历程；见证了他的高尚品格和不断成长。近百年过去，许多内容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研究材料。

1949年10月13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在烈士遗照上题词“魏人镜同志精神不死”。



1949年，李先念在烈士遗照上题词：“魏人镜同志精神不死！”

10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魏人镜为革命烈士，颁发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简称烈属证），背面记载的所在单位及职务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如今，魏人镜与夏明翰、何羽道等烈士一起，长眠于汉阳龟山红色战士公墓，供后人永志纪念。

2022年2月，魏人镜烈士的出生地，汉川市马口镇丁集村成为中央第三批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之一（湖北省35个）。

2023年，汉川市修缮魏人镜烈士陵园，竖起一座新的烈士纪念碑。

钟钢，武钢集团工会原副主席、《魏人镜传》主笔

博学中学首任华人校长胡儒珍

◇ 魏志刚 官剑琴

私立汉口博学中学（今武汉四中）原名博学书院，1899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创办，校址先在后花楼居巷（今花楼街交通巷），1908年迁到韩家墩新址。第一

任院长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马辅仁牧师，自此21年共计6任院长全部由英国人担任。

1929年8月，曾在博学书院就读的胡儒珍，出任私立博学中学校长，才结束这一历史。

确立校训“勤朴博学”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随后国民政府迁来武汉。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经过16次谈判，1927年1月中英双方签订《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汉口英租界。1月19日，湖北政务委员会颁布《湖北取缔外人设立学校条例》，规定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备案，不得沿用教堂名称，不得开设宗教课和进行宗教活动，只有华人才能担任校长等。



佩戴博学中学校徽的胡儒珍

英租界收回，博学书院英籍院长逃离，一度停办。1928年，由中华基督教会接收改组，改名为私立汉口博学初级中学，成立了校董事会。校董会主席唐永和，董事由汉口交通银行行长浦心雅、裕华纱厂股东苏先勤、远东保险公司经理唐远鑑等知名人士担任。

1929年8月，任用胡儒珍为校长，但学校名义上属中华基督教会，实际上仍由英国伦敦会掌握财经、教育大权。

胡儒珍（1895—1967）出生于湖北黄陂，据学校档案记载：民国二年（1913年）毕业于博学书院，协助创办博学书院中国童子军汉口第一队，提升了学校的社会声誉。后赴香港留学，获香港大学理学学士，并取得英国伯明翰舍里欧研究院教育系博士学位，先后任湖北省外专代理校长、省立文科大学教务长、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等职。

1933年，博学初级中学恢复高中办完全中学，校名改称私立汉口博学中学。胡儒珍确立了“勤朴博学”的校训精神和“重理化，习英文”的办学理念，延续百年至今。

在胡儒珍领导下，学校采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出版的教材，部分学科还采用了英文原版教材，聘请了部分英籍教师，保持了较高的教学水平。1931年至1935年间，聘请金陵大学、安徽大学、华中大学和香港大学毕业生任教，同时聘请具有进步思想的诗人高兰和文学家丽尼住校任教。

抗战西迁艰苦办学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博学中学距机场较近，频繁遭到轰炸，1938年春迁到汉口黄石路格非堂（今荣光堂）。但格非堂拥

挤狭窄，被迫停办高中，只办初中四个班。博学中学的校舍，则按照国民政府的抗战计划，拨给难童慈幼院及难民收容所使用。

不久南京沦陷，日军逼近武汉。博学中学与懿训女中同为英国伦敦会所属教会学校，因此两校组织战时联合董事会，决定各携现款3500元西迁，成为最早到四川江津的学校。

博学中学8月中旬抵达江津，9月照常开学。

胡儒珍在《博学中学抗战西迁及复校后之检讨》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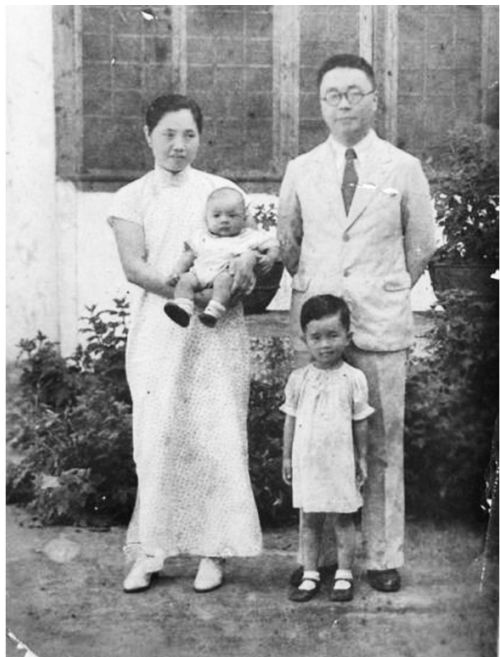
“二十七年秋，南京失陷敌军西逼，武汉动摇，本校于八月二日随政府西迁，竟得四川江津县内火神庙为临时校址。时庙为该县周化成团长之团部所在地，几经接洽，周团长以当地虽属川省文化最盛之区，然向未设立完全中学，爰本敬恭桑梓之义，概允退出，军人能为学校而谦让，诚前所罕见也。”

胡儒珍在《私立汉口博学中学流亡入川后之第一次校务报告（1940年）》中又写道：

“江津地狭人稠，初至时校地颇难觅定，几经周折，始就东门火神庙原址，因陋就简，勉作临时校舍，部署略定，旋即开学。以校舍狭隘之故，仅招收学生四班，计初中三班高中一班，都百余人，教职员开始仅有新旧同事各三人，是年六月，初中部学生一班毕业，内有懿训附读女生六人，至是年经费项下收支相较，不敷约一千三百余元，迨二十八年底，则亏累已达三千元以上矣。”

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博学中学终于在江津站稳脚跟，开办了两个学期，破庙经过修葺也初现校舍规模。

1939年秋，由于日机狂轰滥炸重庆及



胡儒珍、夫人陈馨翰怀抱儿子胡津生及侄女在四川江津

沿江各县，学校又接到政府的紧急疏散命令。原本计划就近迁附近乡镇，由于人地生疏，虽多方派人踏勘，也找不到合适地点。

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安全问题，学校计划西迁峨眉，但又过于偏远，交通不便，董事会不得不转而向重庆求助。从重庆公理会傅先生处得到一条线索，公理会在重庆南岸黄桷垭背风铺有一块土地，可供学校暂时落脚。此处虽然距重庆市区仅十余里，却是重峦叠嶂林木清幽，适宜办学读书。

新址选定后，1939年初冬，胡儒珍代表校方邀请重庆公理会莫工程师筹集建材，开始建筑校舍。数月后，可容两百师生的竹篱茅舍遍布于十亩山丘，计有：礼堂一座，办公室一间，会客室一间，教室七间，实验室一间，教职员寝室四间，住宅五间，学生寝室十间，盥洗室二间，储藏室二间，厨房一间，工役房三间，又修葺了原有的运动场二块。因为战时物价高涨，山地运输困难，所以校舍建设累计花费达21400余元。

1940年1月28日，学校开始从江津往重庆迁移，所有教具和衣物行李箱雇佣木船转运。抵达后，维修道路，添置器具，并在附近山麓开凿防空洞，完成开学筹备。

2月开学，共有7个班，学生人数由100余人增加到350余人，教职员工由17人增至28人。

胡儒珍在《博学中学抗战西迁及复校后之检讨》一文中写道：

“时序如流，倏忽又是三年，胜利仍遥遥难期，而校舍已呈倾倒之势，于是不顾一切，庄材鸠工，拆除草舍，改建瓦屋，易主壁而成土墙，复应当时需要，增建教室，三十三年秋，一律完成，居然辉煌学府矣，甫及一年，忽闻日寇已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幸而得此最后胜利，但以交通阻滞，复员不易，由校董事会派校长回汉筹备一切，渝校委教务主任代理，继续维持，至三十五年八月，始从容迁回汉口原址而复校焉。”

1943年春，随父母逃难到重庆的袁隆平，转学到博学中学读初一下学期。晚年，袁隆平院士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说：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儒珍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并且学有所长。因此，学校经常开展科学、自然、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

胡儒珍在《博学中学抗战西迁及复校后之检讨》一文中亦总结道：



胡儒珍一家在重庆背风铺

“漫长的九年艰苦之岁月，披荆斩棘，其中经历困难，遭受波折，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自首至尾，紧守岗位而不变节者，寥若星辰，盖待遇低，生活苦，故大半教职员难安于位。”“在此八九年之中，不徒学校未因抗战艰难而停止工作，即开学放假，亦从未延误一天，且本校入川之始，既蒙当地人士之欢迎扶助，离川之后，亦留川省同胞以去后之思，是不可谓本校未完成教会之使命，至今思之，实属欣幸。”

奔走呼号返汉复学

武汉沦陷时，博学中学校舍被日寇占据，开办了所谓的“建国大学”，专门培养汉奸。

抗战胜利后，大批日军病俘开始东运，各地病俘集中到武汉等候轮船运往上海，共计6000余人，博学中学校舍临时改成军医院。日军在校内设置的无线电台，被国民政府交通部接收；电讯器材所，又被军政部占

据。一时间，校园机关林立，鱼龙混杂。同时，周边的不法之徒也趁机拆毁校舍。

危急之时，胡儒珍返回学校。1946年4月12日、5月8日，他两次呈文汉口市政府并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要求返还校舍，尽快复学。几番奔走呼号，终于使军医院和电台人员迁出学校。

1946年8月，博学中学迁回汉口复学。

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创办大学先修班，想借用博学中学校舍三个月，胡儒珍提出归还时留下教具作交换条件。这300余件教具，在随后的仓促复学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学校原有完备的仪器和图书，因为西迁成行仓促，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全部寄存于汉口英商怡和堆栈，但因后来英日开战，都被日寇掠夺殆尽。还有无法搬迁的桌椅床凳达2000余件，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且大多残破。从重庆带回的少量仪器，无法满足教学需要，战后新生产的仪器设备质量差且价格昂贵，只能勉强采购试验示范必需



胡儒珍的推荐信

的器材。充实图书报刊及从国外采购仪器设备，都在紧急筹划中。

抗战以前，有英国伦敦会人员在学校义务助理校务，后时局动荡都请假回国，学校在大后方的五六年间与教会失去联系。返汉复学后，伦敦会重新派员来校助理教务。同时，伦敦会远东总干事万多马牧师到武汉访问，向学校捐赠了 2000 余英镑建筑费。

据胡儒珍回忆，博学中学返汉复学后，第一学期学生有 431 人，高中采取学年制，初中采取学期制；第二学期增招新生插班生共 11 个班，学生达 491 人，其中有初三应届毕业生一个班，计 22 人；第三学期高中班完全恢复，共有高中班 4 个、初中班 9 个。由于顾及各方关系，学生骤增至 600 余人，办学压力巨大，所以新学期又想尽一切办法，将学生人数降到 400 余人。

胡儒珍多次致信华中大校长卞彭年，推荐博学中学优秀学子到华中大就读。

胡儒珍在《私立汉口博学中学报告书》中记载道：

“本校自战后复员以来迄今已经过三个学期……一切情形渐复旧观，设备方面现已制齐五百学生之木床及桌椅，总堂两用大长凳制就一百五十条（共值国币约拾亿）；图书馆已新添书籍二千余册（共计国币二亿）。学校校舍除余两操场一角外皆已修理完竣。大操场农场皆已重新整理一切。战壕车壕皆已削高填低平复如初。可说内外情景渐复旧观（修理购置以现值估共值将近百亿），惟本校现仍需急待修理与复员者厥为教员住宅、校长住宅……”

1949 年 5 月，胡儒珍因身体原因请病假一年，由汪筠庵代理校长。年底，胡儒珍回校参加校庆活动并致辞。后在武汉交通学



1950 年春，胡儒珍一家在汉口

院任教，并在中国博医会医药技士专门学校董会任董事长。

胡儒珍 1967 年因病去世，其家人在辽宁抚顺工作生活至今。经多方寻访，后代为本文提供了珍贵的老照片。

胡儒珍作为私立汉口博学中学的奠基人和校长，确立“勤朴博学”的校训精神，励精图治，使之成为湖北地区首屈一指的新式学堂，办学质量优异，社会声誉日隆；他带领学校历经抗战西迁和返汉复学，赓续博学火种。

魏志刚、官剑琴，分别为武汉第四中学校办、党办主任

非常时期搅热“冬日马戏场” ——武汉杂技团三次炫技法兰西之二

◇ 何忠杰

1989年秋冬，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所谓“制裁”，中法关系一时处于冷淡期。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基本处于暂停状态，一般不派大型演出团体到欧美演出。

此时，中演公司为一份早先与法国演出商隆布罗索先生签订的协议而犯难：武汉杂技团“去”还是“不去”？去，法国的反华宣传正甚，人员安全、演出效果会有风险；不去，中方不仅要退还30万法郎的定金，还要再赔付30万法郎的违约金。

此时，远在法国的隆布罗索仍在为“执行协议”积极奔忙，他一方面多次拜访中国驻法大使馆，力促武汉杂技团成行；一方面三番五次游说法国政府有关部门，力劝那些把关官员为武汉杂技团放行。

此时，我国文化部与驻法大使馆的电

话、传真频繁往来，分析形势，权衡利弊。经过反复商议，文化部领导最终决定：去！因为这既是一次履行既定协议的访演，也是一次体现中国诚信的访演，更是我国政府所期待的打破“封锁”“制裁”的机遇。风险虽有，但事在人为。

文化部将请示呈送党中央、国务院，经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由国务委员李铁映签批，同意武汉杂技团到法国访演。

夏菊花在文化部立“军令状”

文化部与武汉市政府函商后决定，由夏菊花任团长率武汉杂技团再访法国。文化部为出访制定了“搞好演出，宣传中国，确保安全”的方针。



1989年12月31日除夕，武汉杂技团圆满完成最后一场（第82场）演出，在夏菊花（前排左二）带领下谢幕，全场欢声如潮

夏菊花在文化部领命时，分管外事的副部长刘德有对她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央批准武汉杂技团赴法演出，这是第一家，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你们的高度信任，你们一定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外事纪律教育，艺术、作风都要好。要做到绝对保险，万无一失。文化部外联局领导不无担心，要求她写下保证书，保证人员安全。夏菊花充满信心地表示：请部领导放心，我们武汉杂技团是一个政治上、艺术上都过得硬的队伍，我们向来能打硬仗，我们一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圆满完成任务。

夏菊花在文化部立下“军令状”后，部领导一再叮嘱：目前的形势确实相当复杂，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呀……

在出访动员会上，武汉市文化局和杂技团领导都特别强调了此访的重要性、特殊性，他们说：“菊花同志在部领导、市领

导那里是打了保票的。这次出访关系国家声誉，也关系国格人格尊严，大家一定要提高政治觉悟，在言行举止上不能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

夏菊花语重心长地说：“这次出访法国，是在国际舆论对我国进行不利宣传诋毁的形势下去的。这次出访任务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和考验，我们一定要以政治上的坚定、艺术上的严谨、生活上的严格要求出色完成任务，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在具体布置任务分工的党团员、班组长骨干会上，她又特别强调外事纪律说：

“这次出访不能有一点差错，组织纪律不能有一点松懈，即使是行动上的一点点疏忽，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任务，演员们个个表示：坚定爱国立场，严守组织纪律，认真搞好演出，维护国格人格，为国争光，为团争光。

隆布罗索买 20 瓶茅台暖场

1989 年 10 月 25 日，夏菊花率团在北京国际机场登上了前往巴黎的航班。到达巴黎的当天，戴高乐国际机场天气阴沉大雾弥漫，飞机只得临时改降奥利国际机场。我们走出机场的时候，只有隆布罗索和我国驻法使馆文化处的几位人员接机。这与 1965 年抵达机场时各路记者云集、欢迎人群手持鲜花簇拥形成鲜明的反差。

演出点安排在“冬季马戏场”，这是法国巴黎“明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比赛场地。为了首演一炮打响，大家不顾空中飞行 19 小时的疲劳和 7 小时的时差带来的不适，在旅馆安排完住宿后，就赶往剧场装道具、排练直到深夜，又连续工作近 7 小时。

10 月 28 日首场演出，上座率虽不到 50%，显得冷清的剧场却被法国人天性率真的热情点燃，他们对每一个节目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上座率不到 50%，大家不由着急，更为今后的上座率担忧。随团的中演公司代表宋天仪处长分析，这是由于出访时间几经变更，演出商不能提前宣传，影响了上座率。使馆文化处的同志说：风波之后，巴黎的法中友好气氛降到了最低点，这对巴黎市民观看中国杂技的兴趣直接带来了影响。

隆布罗索根据观众的热烈反应，则显得胸有成竹。首演之后，他特地买来 20 瓶茅台酒，在“冬季马戏场”的酒吧举行了祝贺首演成功的酒会。他一再对宋天仪和夏菊花表示：“不用着急，也不用为票房担心，这么好的节目，上座会好的，观众会来看的。”

夏菊花也表示，结识隆布罗索先生这样富有国际演出经验的演出经纪人，是我们

的荣幸，我们武汉杂技团一定要加倍努力，用我们的节目和技艺来做最好的宣传，来为中法人民的传统友谊做出贡献。隆布罗索向演员们祝酒时反复说道：“会好起来的，我相信艺术的力量，我相信武汉杂技团一定能够重新征服巴黎的。”

首演之后，78 岁的隆布罗索老先生，放心地到瑞士度假洗温泉去了。

马戏场终于沸腾起来

半个月后，隆布罗索度假回来，看到的情景果真不出他所料。

随着一场一场演出的正常进行，中国杂技的魅力和武汉杂技团的精湛技艺，也一天一天在巴黎市民中口口相传。排队买票和提前订票的观众逐日增多，上座率逐日上升，终于使“冬季马戏场”沸腾起来，连连爆满，到处加座，以致连台阶、走道和乐队席周围都挤满了观众。虽然当时中法关系处于低谷，但各界政要名人也一个一个由冷漠静观转为亲切示好。

法国“明日”杂技节主席莫克奈尔热情赞许：“演出太精彩了！”

一些政府部长如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前农业部长等都带着家眷，接二连三微服出现在观众席中。

巴黎市长希拉克特派副市长前来热烈祝贺演出成功，赞扬“武汉杂技团征服了巴黎。”

巴黎市民依旧喜爱中国的杂技。当身着鲜艳玫瑰红服装的女演员表演《转碟》的时候，当年轻的小伙子在《桌圈》中鱼跃腾越的时候，当两名演员在《扛杆》上轻松自如来回穿梭的时候，当别开生面的《柔术顶碗》做出一个个高难绝技的时候，当七名演



李莉萍表演《柔术顶碗》“乌龙绞柱”

员完成斜塔式的《椅子造型》的时候……每一个精彩动作或每一个精彩节目成功的时候，都会爆发出热烈掌声。中演公司宋天仪处长和杂技团冻庭云书记都作过统计：一个节目最多时赢得24次掌声，一场演出最多时鼓掌次数达200多次。尤其是青年学生场气氛更为热烈，掌声、喊声、哨声、欢笑声响成一片。当报幕员宣布“演出到此结束，祝大家晚安！”的时候，场内齐声高喊“NO！NO！”表示兴致未尽，没有看够。

我国驻法使馆的同志，都为这来之不易的热烈场面而感动。他们说：“这是在西方国家诋毁、制裁中国后难得见到的热潮。”“你们的演出，确实扭转了法国人因风波造成的对中国的偏见。”“观众的热情证明，法国人民对中国仍然是友好的。”

法国新闻媒体也逐渐活跃起来。《费

加罗报》以“真正的杰作”为题发表评论说：

“从狮子舞开始，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便开始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你享受到的尽是神奇与精巧。”“无需任何联想，因为每一个节目都是一部杰作，都有其高超与令人陶醉之处。”“观众惊呆了，这是多么的多姿多彩！多么潇洒！多么优美！多么的不可思议！”

看过演出的法国观众，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演员的热情。

在演员每天从旅馆到剧场，或是演完回旅馆的步行路上，常常遇到一些观众热情鼓掌或伸出大拇指，请演员在节目单上签名。

幕间休息时，一位中年妇女领着她的孩子来到后台化妆间，激动不已的让孩子亲吻所有在场的演员。

一位远道而来的法国老太太，看完演出后非常激动，随身取出一张500法郎的支票交给团领导，一定要表达她对演员的心意。

一群小学生看完演出后的第三天，送来了他们用两张大红纸写的感谢信和一本厚厚的速写画集。这些在老师指导下完成的作业，画了孩子们喜爱的转碟、顶碗、钓鱼、爬杆、车技、钻圈、水流星、顶坛子等场景。在画页的空白处，还写着一些充满童趣的话：“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样爬到竹竿顶上去的？”“我看得真痛快！”“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学会钻圈、蹬桌子、顶碗的？”“中国叔叔阿姨们，我们非常喜欢你们，真希望你们到我们学校来玩。”“献给中国杂技团，你们的节目真是令人难忘！我们为你们叫好，你们真了不起！！！”这些天真纯洁的语言，表达了法国儿童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和中国杂技艺术的喜爱。



集体表演《女子车技》

“冬季马戏场”经理和工作人员，对武汉杂技团热忱相待、友好合作。为了配合中国杂技演出的气氛，马戏场特地为男服务员制作了一身青色对襟中式服装，脚穿中式功夫鞋，增添了场内的中国元素。

根据合同，这次演出的日程是每周演出9场，看似不多，但星期六连演3场则是对演员体力和心理的一种极限考验。场次中间，大家没有时间回旅馆休息，只能在后台找地方，躺一躺，缓缓劲。尤其是那些体力付出较大和负重较多的“底座”“二节”演员，如丁少安、万建民、李芝森、陈汉生等，也都抓紧时间趴在海棉垫上，让人踩踩揉揉，以缓解腰背的疼痛。中国演员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使“冬季马戏场”的工作人员感叹不已。剧场经理对团领导说：“我是个好发脾气的人，我接待过很多外国艺术团，对他们都发过脾气，唯独对你们例外，因为你们演出认真，热情友好，演员懂礼貌、守纪律。我真希望你们能再延长3个月演出。”

在马戏场做小买卖的一位女服务员，在我们每天练功的时候，都要与女演员一起练练身段、腰腿。她告诉夏菊花，她也是一位马戏演员，因为法国马戏不景气，无法维持生计而失业，只好在马戏场内挎着篮子叫卖糖果。她说：

“我真羡慕中国演员，羡慕中国杂技。”希望团长能够收她为团员，随武汉杂技团到中国参加演出。

湖北天门籍的余姓老太太85岁高龄了，她在子孙的陪伴下，目不转睛看节目，眼中慢慢溢出来热泪。演出结束后，老人催着儿孙扶她到后台，用地道的天门话和演员拉家常，她说：“我出来65年了，做梦都想着家乡和亲人。去年回了一趟天门，天啦，硬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哒，变化太大哒！刚才看了伢儿们的演出，我喜得不得了，以后你们多来几趟撒！人老了，就是特别想家、想亲人，见到你们就像见到了亲人。”在一旁的女儿说：“妈妈年纪大了，轻易不出门，听说家乡来了亲人表演，硬要我们扶着她来看，你们演得好，我们脸上也有光。”几个孙辈孩子已不会说中文，一个劲伸着大拇指喊“勃拉沃”。

我国在法国工作访问的两位核动力专家，特地跑到后台激动地说：“今天，我们沉浸在法国观众热情友好的掌声和欢呼

声中，感动得掉下了热泪，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我们中国人哪一样都不比外国人差。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化艺术，你们的演出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侨居法国的钱法仁一家观看演出后，立即给团长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贵团此番在巴黎胜利演出，观众一致称赞，街谈巷议，均谓叹为观止”“国民良好外交，无法估计，将起到莫大作用”。

文化部发文专项表彰

事实证明了隆布罗索的预言：“我相信艺术的力量，我相信武汉杂技团一定会重新征服巴黎！”

宋天仪处长身临其境，深有感触地说：“这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这是靠精湛的技艺扭转法国人偏见的巨大成功，这是演员们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巨大成功。”

长期致力于法中友好的一位老朋友，专程从法国南方赶来巴黎看望，在请中演公司代表和团领导进餐时说：“前段时间巴黎群众受新闻舆论的影响较大，这次你们派杂技团来巴黎演出，赢得了巴黎人民的赞誉，消除了一些人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这说明绝大多数法国人对中国是友好的，是热爱中国和中国艺术的。”他深情地说：“中国的艺术是高水平的，你们的演出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国驻法使馆对这次访演十分重视，使馆和文化处始终对演出和日常生活给予积极支持和热情关心。文化参赞吴春德，每天都要到住地和演出场地了解情况，帮助处理相关事宜，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力保障。

驻法大使周觉观看演出后十分高兴地

说：“你们这次能到法国演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信任。你们在巴黎演出82场，场场观众都这么热烈，没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和精湛艺术，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不仅欣赏了你们的艺术，也分享了法国人民的友谊和热情掌声给予的荣誉。你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你们的信任。你们帮助使馆开展了文化外交，不论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

武汉杂技团作为非常时期派往西方的第一个大型艺术团体，不辱使命，凯旋归国。1990年1月，文化部发出《关于表彰武汉杂技团的通知》：“武汉杂技团1989年10月下旬至年底赴巴黎执行有偿演出任务，在为期两个月、多达82场的演出活动中，该团全体同志自始至终以精湛的艺术、严格的纪律和良好的道德风貌，赢得了法国观众、演出商和剧场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和高度赞誉，得到我国驻法大使馆的表扬。在当前形势下，武汉杂技团的演出成功为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宣传我国形象和反映我国人民精神风貌做出可贵贡献，特予表扬。希望武汉杂技团继续发扬好思想、好作风，在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并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与此同时，武汉市政府也给予武汉杂技团以表彰和奖励。

一次商业性演出，受到文化部和市政府的表彰，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何忠杰，原武汉杂技团副团长

《武钢文艺》：六十年的情愫

◇ 董宏量

当我 18 岁那年走进武钢的大门时，绝对没想到，在这个风呼火啸的钢铁世界里，我会与一本文学期刊结下深厚的情缘，一直编刊到退休。一期期刊物，就像一篇篇诗歌，记录着钢城的春风秋雨、朝霞晚晖。因此，在《武钢文艺》创刊 60 周年的时刻，抚今追昔，就像翻开了一本厚厚的诗集。

创刊

1958 年 9 月，武钢出铁投产。郭沫若来钢城挥毫题诗：“铁水奔腾似火龙，高温千度映天红；武钢接踵鞍钢后，建设规模气势雄！”

高炉耸立，红雨缤纷，新中国第一钢都的文化建设也引人注目，充满诗意。早在



1957 年《武钢工地之花》创刊，1959 年改名《武钢之花》，1964 年《武钢文艺》创刊

建设初期，便有赵寻、力扬等作家诗人来编写“建设史话”，培训工人作者，还创办了文艺刊物《工地之花》。李建纲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去工地的路上》，并由此推荐参加

“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王维洲、蒋育德等工人诗人组建了“扬子江诗社”，在《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诗作。

“钢城喜事真是多，诗歌要用汽车拖！”随着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开辟学园地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工人俱乐部写唱词的李建纲，就起草了关于创办《武钢文艺》的请示，得到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孙振茂等领导的大力支持。

“《武钢文艺》就这样在钢铁的铿锵声中出世了。记得是1964年4、5月间的事。”李建纲后来撰文回忆，他是怎样去印刷厂帮忙捡铅字，又是如何拖着俱乐部拉道具的板车把创刊号送往各厂。因为内部刊物等同于学习资料，上班时也可翻阅，《武钢文艺》深受欢迎。没想到两年后风暴骤起，这本刊物也成了一个靶子受到批判，编辑部被大字报封门，还有两个工人师傅来“夺权”。他老老实实交出公章，工人师傅却不准他走，说：“我们喜欢看《武钢文艺》，要和你一起编！”

结缘

我是1971年进厂的修炉工，虽瘦弱笨拙难舞钢钎，却因善用钢笔而当上了车间宣传员，不断创作顺口溜：“昨日贺钢今庆铁，欢锣喜鼓敲不绝，一对檀木新鼓槌，磨得只剩大半截！”

1973年10月，我写在炉台黑板报上的一首诗《摆开巨杯接红酒》，不知被谁抄录寄给了《长江日报》，发表后轰动全厂。于是，我被调到厂工会搞宣传。当《武钢文艺》在1974年复刊，我就成为了它的重点作者，常被召去开会。

红钢城一角的编辑部，一直都是李建



1975年，高炉上的青工董宏量

纲唱独角戏，现在终于有了几个人马，可以开展创作活动，我由此结识了蒋育德、王维洲、李声高等久仰的钢城作家，按习惯称他们“师傅”。倾听他们的高谈阔论，感到眼界顿开，生活多了一种韵味。印象最深的，是矿山来的陈龄编稿非常认真，用红墨水在稿纸上圈圈点点，宛如散开一片红花。李建纲风度翩翩，自嘲个子太高，拖板车送刊物下厂就像一只晒红的大虾。

编辑部磁石一样吸引着文学爱好者，不断有新人出现。因都住工人村，炼铁厂青工王继常常揣着一本书找我吹牛，然后掏出书限定当晚看完。他很幸运，小说一出手就上了省级刊物，还被爱才的孙振茂（此时任武钢纪委书记）看中，调进《武钢文艺》编辑部。

相比之下，我的调动十分困难。李建纲等老作家调往省作协后，编辑部极缺人手，且孙书记雄心勃勃，拟建创作中心打造精品。尽管我多次被推荐，但厂里硬是不放，认为我是个人才，必须用中专以上文凭的“知识分子”来换，一直拖到1981年秋天才放行。



《武钢文艺》1974年复刊号、1984年第1期、2014年创刊50年专号

接班

此时，接任《武钢文艺》主编的是周学南，他曾在修建部搞宣传，很欣赏我写的“鼓动诗”。我们常坐在工棚里聊天，得知他曾是市文联专业作家，解放初进过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1957年来武钢挂职体验生活，不幸被打成右派。好在武钢人宽厚，仍用他一技之长。我和他一起编写“高炉检修战报”时，真没料到他平反后，会调到《武钢文艺》，成为我的顶头上司。

周学南是个有点古板的老头，办刊特别认真。那时刊物在鄂州印刷，得坐火车出差，住在旅馆里校对。因历经坎坷，他对文字如履薄冰，生怕出错。校对是唱校，即一人朗读一人校对，发现错别字，他就会击掌感叹：好险！又抓到了一个“特务”！我调来后，他对我和王继看管甚严，每有倩女来访，必加密切关注，语重心长叮嘱我们“把好政治关、生活关”。

当编辑后，我才知道这一行不简单，《武钢文艺》面对职工，不像外刊可四处组稿，而要专注热土播种育苗，编辑如果学识不足就会捉襟见肘。我初中毕业就当知青，虽然读书甚杂，却深感要充电加油。好在省作协

创办文学院，我入选为首期学员，接着又到武汉大学中文系进修，才算有所长进。

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年轻人都以写诗作文为荣。我和王继想把刊物办得更有朝气，便召集一群年轻作者，举办文学沙龙，主要人员有喜宏、池莉、李更、罗时汉等。我们交流信

息，探讨作品，发现好稿马上就可选用。王继出版长篇小说，我出版诗集，都是彼此帮助取名。

1984年秋天，《武钢文艺》创刊30周年，周学南年高退居二线，我接任主编，从此就扛上了一副沉甸甸的重担。

接任主编后，我才深刻意识到，一个钢铁企业，能办一份文学刊物是相当不容易的，《武钢文艺》必须为企业服务才能生存发展。因为在相当多的一些人眼中，它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还会惹是生非造成不良影响。我的前任李建纲、周学南都是小心谨慎，惟恐别人抓辫子，把刊物砍掉了。

那么，我们必须让领导觉得这本刊物有用，不仅能活跃职工文化生活，还能赞企业之功，扬武钢之名。于是，排列在前的栏目，总是“钢城纪实”“劳模风采”“生产热线”“营销先锋”……以至有人称刊物为“劳模档案”。

但把《武钢文艺》办成全国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由此我把办刊方针归纳为四句话：“立足企业，面向职工，文学园地，作家摇篮。”好在新人辈出，编辑部实力雄厚，杜为政、周震亚、罗时汉、郑建荣、王志钦等，都是省内有影响的作家。



1992年，武钢十位作家签字售书

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笔会、年会、文学讲座、下厂辅导……十天半月的笔会最受作者欢迎。接到编辑部的通知，作者可自豪地请假脱产创作，还有编辑老师细致辅导，成熟的作品马上刊用。

笔会最初在矿山举办，住的是招待所，吃的是大食堂。后来写出了成果，就可走出钢城，选择外地的好山静水。

90年代初，因深感作者青黄不接，我们又创办武钢文学院，并得到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支持。文学院“不收学费收作品”，每周三晚上开课，一时轰动钢城。武汉大学陈美兰、易中天等著名教授，都曾坐公汽来讲课。文学院接连办了14期，走出黄春华、李榕、童喜喜等新锐作家。

《武钢文艺》编辑部成为温暖的文学之家，每周有聚会，每月有活动，每年有评奖，帮助作者出版作品、调动工作等，我还曾荣幸的为多位作者证婚。能结交众多文友，真是一种幸福。当你漫步钢城，常有人对你点头微笑，你就会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

《武钢文艺》丰富了几代人的文化生活，给钢铁注入了绵绵的诗意和脉脉的温情。当主编后，我写得最多的是“编者絮语”，

我曾写道：“《武钢文艺》就像一栋爬满常青藤的老房子，门永远敞开着，不论你何时来，我们都在这里等你。”

当了30多年的看门人，我终于退休了，没想到还会梳理白发，喜迎创刊60周年大庆，并再次回答一个有趣的提问：《武钢文艺》为何长盛不衰，与红房子、咸汽水合称为“钢城三绝”？

显然，这是大时代的造化、大钢都的锻造。因为拥有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广阔的创作空间，只要你来到钢城，追求精神的饱满、人生的丰盈，就注定要与《武钢文艺》相逢、结缘，浇铸梦想和诗情。



2023年10月，90岁的李建纲（曾任湖北省作协常务副主席）与70岁的董宏量在一号高炉纪念馆前

董宏量，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冶金作协副主席，《武钢文艺》原主编

老汉口的“洋码头”

◇ 李笙清

汉口在明代就是“泽国舟为市，人家起竹楼”的水网之乡，水运业发达，码头业兴盛。往返于鄂苏皖一带做生意的徽州人，将汉口称为长江三大码头之一：汉口“船码头”，镇江“银码头”，无锡“布码头”。

自1861年汉口开埠，武汉沿江码头发展到200多个，大部分在汉口，其中由外商控制的“洋码头”就达数十个。

开埠伊始，西方列强除了争先恐后建租界、办工厂、设洋行之外，还利用夺取的“内河航行权”垄断长江航运，对汉口沿江的码头业虎视眈眈，抢占深水港域的优越位置，建起码头、栈房、趸船等。因此，汉口的码头经济由汉水内河码头向长江通商码头转移，热闹市面也从硚口一带下移至江岸一带租界区。

据1908年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记载，江汉关对沿江修建码头享有决定权。各租界要在沿江一带建码头，必须与江汉关监督磋商，并由相关人员检查地势，而江汉关监督长期由英国人担任。

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捷足先登，在英租界宝顺街（今天津路）江岸修建宝顺栈五码头，这也是汉口最早的“洋码头”和最早的轮船码头。

宝顺栈五码头的建立，使其货物吞吐更为便捷，俄商眼红了，于1871年修建顺丰茶砖栈厂码头，专供汉茶出口外运之用，地点在俄租界列尔宾街（今兰陵路）沿江地段，这也是汉口最早的外商专用码头。

英、俄先例一开，列强觊觎不已，纷纷采取行动，瓜分码头这块令人馋涎欲滴的蛋糕，争相在租界沿江修建码头，主要有：江汉关到合作路英租界的太古、怡和、鸿安、麦边等英商码头，其中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于1875年分别建成一码头和三码头；合作路至黄兴路俄租界的日本大阪商船会社、俄国新泰货栈码头；黄兴路至一元路法租界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法国东方轮船公司等码头；一元路至六合路德租界的汉堡亚米利加栈、美最时、瑞记、亨宝等德商码头；六合路至吉林路的日租界三菱、日华、太平洋等日商码头。



据《续辑汉阳县志》记载，清同治年间（1862—1875），从龙王庙到江汉关，“洋码头”已达16个。此外，还有日清等轮船码头，平和、隆茂等棉花打包厂码头，美孚、德士古、亚细亚等石油公司专用码头等。一时间，地理位置最好的码头，几乎全被外商占据。汉口码头的年货物吞吐量，一度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

除了在租界区开辟码头外，列强对租界以外的重要地段也不放过，先后修筑了太古码头、下太古码头等一批码头。这些码头规模庞大，如在丹水池车站南侧的美孚石油公司码头，可停泊千吨级油轮。到1907年，英、日、德、法、美等国开办9家轮船公司，29条轮船航行于汉口。

“洋码头”主要有浮趸式和浮船式两种，可随长江水位的起伏而升降，一般规模较大，设施齐全，装卸等设备先进。太古、怡和、大阪3家轮船公司就在江边修建了6大间栈房、3处堆栈，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以上，仅大阪轮船公司的码头就有50尺宽、250尺长，规模和设施远超本土码头。

“洋码头”的兴建，使汉口港迅速成为近代国际港口。自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开辟汉口至日本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开始，到民国建立之初，由汉口港驶向国外

的轮船，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莱梅，荷兰的鹿特丹，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德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埃及的塞得等地。

1910年民国建立前夕，“洋码头”达到74个，码头范围也从江汉关延伸到丹水池、谌家矶一带。

“招商太古到怡和，又向华昌大贩过。海舶江轮排似节，大船争比小船多。”民国初年，罗汉写下的这首《轮船码头》竹枝词，可说是“洋码头”状况的真实写照。

1926年巅峰时期，“洋码头”大大小小竟有87个之多。

“洋码头”对中国人特别是对苦力的压迫和剥削甚重，码头工人进行过多次抗争，还成立了码头工会和工人纠察队。1925年6月10日，因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职员打伤搬运工人余金山，引发全体码头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1927年，苗家码头发生“一三”惨案，共产党人领导和推动武汉人民掀起反帝斗争的高潮，最后迫使英方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赢得了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伟大胜利。

1937年抗战前夕，受德、英、俄等租界被中国政府相继收回、世界经济萧条和战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汉口长江码头规模远不如从前，“洋码头”也锐减至36个。

武汉沦陷期间，“洋码头”全被日军侵占，除了少数为日清轮船会社和汪伪政府所办公司用作客、货运营之外，大多被改作军用，为日军侵略服务。

武汉解放后，“洋码头”一去不复返。

李笙清，武汉博物馆文博馆员

地质世界的科普殿堂 ——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

◇ 彭 磊 唐晓玲 徐 燕

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位于武汉东湖之畔、南望山麓，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和首家认定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的高校博物馆。

逸夫博物馆依托学校特色学科而兴建，主体建筑落成于2003年，融合了地质学、仿生学和天文学诸元素，曾获湖北省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现已成为东湖风景区亮丽的地质科普景观。

“中国大型恐龙展”轰动三镇

逸夫博物馆的建设，与新中国高等地质教育发展同步。它的前身为成立于1957年10月8日的北京地质学院陈列馆，首任馆长为我国工艺岩石学开拓者、著名工艺岩石学家苏良赫教授。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高等地质教育

工作的实践性很强，教学时学生需要实际接触、观察、鉴定矿物、岩石、生物化石和矿产等标本实物。当时，除了从北大、清华等校转交过来的部分典藏地质标本外，学院利用野外教学实习特别是科研机会，发动师生在全国各地采集地质标本。到60年代中期，陈列馆已达到相当规模。

70年代学校南迁武汉后，由于恢复和发展高等地质教育的需要，1982年11月重建后的武汉地质学院博物馆开馆。1988年夏，博物馆首次在武汉展览馆举办“中国大型恐龙展”，深受市民喜爱，一时轰动三镇，每天接待观众近4000人次。

2001年博物馆新楼建设启动，2003年建成开放。

逸夫博物馆设有多个专题展厅，陈列着反映地球46亿年沧桑巨变及地球生命38亿年进化历史的各种矿物、岩石、珠宝玉石、



古生物化石及矿产地质标本等。可以说，博物馆展览的每一块石头，都包含有一个生动而悠远的故事，既记载了地球的沧海桑田，也反映了人类探索地球奥秘、征服自然的科学进步历史。

想了解人类居住的星球，进入“行星与地球”展厅，可以沉浸在浩瀚星空中，感受从宇宙到地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领略地球46亿年的沧桑历史。在这里，可以通过影像技术，生动而形象地“看见”太阳系八大行星的运行关系。通过光电技术制作的地球结构模型，可以直观了解地球的结构，领略直径1.5米、与黄道面呈23.5度夹角倾斜旋转的磁悬浮地球仪的风采。在形态逼真的溶洞里，可以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体验人造地震平台所带来的大地的颤动。

在“生命起源与进化”展厅，以承载生命印记的古老化石为线索，展现地球上生命的进化过程。在这里可以了解到，距今约38亿年的太古宙初期，就产生了具有遗传复制和新陈代谢能力的原始生命，实现了有机生命的无机诞生，生物界自此开始经历由单一到多样、低级到高级、海洋到陆地的进化过程。

“矿物岩石展”像一册用矿物、岩石标本写就的教科书，展示了矿物之美，也揭示了矿物与岩石的关系。

“珠宝玉石展”突出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宝物，珠宝界的“五皇一后”雍容华贵，玉石世界古老神秘，有机宝石生机盎然，争着向观众述说着大自然造物之神奇。

“矿产资源展”介绍了与人类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矿产资源，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能源的未来还有着无限的可能。

“张和捐赠化石专题展”是博物馆中最“年轻”的展厅。2007年，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理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客座教授张和捐赠了260余件珍贵的古生物化石，为大众揭开了辽西这个誉为“世界古生物化石宝库”的神秘面纱。

逸夫博物馆收藏陈列的精品标本近3000件（套），其中100平方米的化石幕墙、似花非花的海百合化石、精美绝伦的各色宝玉石、五光十色的矿物，以及恐龙骨架、恐龙足迹化石等，为观众讲述着自然与生物的神奇故事。

“远古生命足迹”遗迹化石幕墙

走进逸夫博物馆前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块面积达100平方米的“远古生命足迹”遗迹化石幕墙，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2亿多年前生命演化的精彩故事。

若不注意看，会以为这是一面十分普通的由一块块长方形石砖拼成的石墙。其实，它是一块完整的以“龙”足迹和鱼类游迹为主的遗迹化石。化石幕墙右边那条规矩的正弦曲线，是当时鱼游动时鱼鳍扫出来的痕迹；下边一道道弯曲的线条，是无脊椎动

物在水底爬行觅食时留下的痕迹；左边大量的爪子印，则是四足动物留下的足迹。

这块化石幕墙标本，极大丰富了我国晚三叠世足迹的资料。2亿多年前的晚三叠世，是脊椎动物演化的关键时期之一，恐龙就是在这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化石幕墙足迹化石标本，又是解密晚三叠世关键时期脊椎动物演化、组成和行为的重要资料。

化石幕墙 1998 年由地大教师卢宗盛发现于陕西北部，整整花了 5 年时间才将其挖掘出来。虽然这块化石只有 5 到 10 多厘米厚，上面却覆盖了 20 到 30 米厚的岩石，将其从化石表面剥离开来并非易事。化石层剥离出来后，又将其分解成 60 多块，每块重达 400 公斤左右，依靠人力抬到马路交付运输。化石散块及附带物总重量接近 100 吨，全部到达博物馆后又耗时 3 年，才将 60 多块化石组成高 7.2 米、宽 13.9 米的幕墙拼接完成，完整展现在观众面前。

黑龙江满洲龙化石

黑龙江满洲龙是恐龙家族中的晚辈，生活在 6700 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是一类以植物为食的素食恐龙。它们那两条巨大的后腿与长长的尾巴，构成一个类似于三脚架



的装置，足以支撑其笨重的躯体。前肢短小，可以用来抓取树上的枝叶。高昂的头上，有着一张扁平的类似鸭子的嘴，还长着数百颗小牙齿。这些牙齿呈细小的棱柱形，一层层地镶嵌排列，数量多达上千颗，是所有恐龙中牙齿最多的一类。

黑龙江满洲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种恐龙化石，也是我国最早科学命名的恐龙化石。发现黑龙江满洲龙化石的地方，在黑龙江省的北缘嘉荫龙骨山，这里曾是恐龙生活的乐园。

1902 年，黑龙江沿江两岸的地层，由于江水的长期侵蚀，埋藏的恐龙化石陆续暴露了出来。当地渔民发现这些化石的消息不胫而走，吸引了对岸的俄国军官前来调查并采集化石。1915—1917 年，俄国地质学家连续到我国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和发掘，对采到的化石进行修理并配上石膏模型装架，陈列在圣彼得堡地质博物馆。经地质学家研究认定，这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具恐龙化石，因为它的嘴巴扁阔，和鸭子嘴十分相似，所以称为“鸭嘴龙”；又因为它在满洲发现，又称为“满洲龙”。

1978 年后，黑龙江省博物馆对嘉荫龙骨山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大规模野外发掘，又发现了一批新的满洲龙化石。80 年代初，在黑龙江校友的协调下，地大博物馆馆长王良忱、副馆长黄伯裔等人多次前往哈尔滨商议其中一具恐龙骨架移交事宜。他们坚持不懈的精神感动了黑龙江省博物馆，最终将这具满洲龙有偿交换给地大博物馆，成为从事古生物教学科研的重要标本。在新旧博物馆“安居”期间，这具满洲龙历经两次拆装，最终以栩栩如生的姿态，傲立在博物馆二楼大厅中央，向来现场的观众诉说远古生命的故事。

关岭创孔海百合化石

你见过长在大海里的百合花吗？走进逸夫博物馆“生命起源与进化”展厅，迎面就可看到一座 15.7 平方米的海百合化石上，数十朵绽放的百合花栩栩如生，根、茎、冠全都清晰可辨，好似艺术大师的雕刻作品。这块创孔海百合化石产自贵州关岭，为海百合纲的一属，距今 2.3 亿年，其特征清晰，保存完整。

海百合是棘皮动物门海百合纲海生无脊椎动物的统称，最早出现于距今约 4.8 亿年前的奥陶纪早期。几经兴衰，已发现 5000 多个化石种，在现代海洋中仍生存有近 700 种。约 2.3 亿年前，海洋里到处是海百合的身影，有的附着在漂浮的树木上，有的与苔藓虫和腕足动物一起在海底形成草地般的大面积覆盖，留下了许多化石。它们的身体有一个像植物茎一样的柄，柄上端羽状的触手称之为腕部，通过张合摇曳过滤海洋碎屑为食。

一个理想的海百合化石，由根、茎和腕三部分组成，但大多数极难完整保存。由于海水的扰动，这些茎和腕总是呈散乱状态，失去了百合花似的美丽婀娜。但如果它们恰好生活在特别平静的海底，其姿态就会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化石。由于这种环境比较苛刻，所以完整的海百合化石尤为珍贵，不仅为地质历史时期的古环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也逐渐成为化石收藏家的珍品，当作工艺品摆放。

逸夫博物馆不仅是地大师生专业学习的场所，也是向社会大众普及地学文化的课堂。面向儿童的“博物馆奇妙夜”，举办地质科普亲子游，拼化石，做拓片，实现“与



恐龙做邻居”，激发兴趣，寓教于学；面向初小学生的“达尔文实验站”，让学生走进专业实验室，体验化石修复，提升动手能力，亲历科研程序；面向高中生的“科技英才”项目，让学生完整参与从制定选题到结题报告的科研工作，教授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思维；面向全国大学生的化石及古生物科普知识竞赛，讲好地球故事，传播科学精神，提升综合素质。

2022 年正值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建校 70 周年、逸夫博物馆迁汉开放 40 周年，精心策划了“晶彩地球，矿物世界——世界矿物精品展”“七秩难忘——校友捐赠藏品展”等特别展览。前者陈列了近 300 件全球不同矿区的矿物精品，均为地大校友刘光华博士的个人收藏品。后者集中展示了 70 件珍贵的藏品，如珠穆朗玛峰岩石化石标本、南极火山熔渣、浙江长兴“金钉子”剖面点位标本等。

彭磊、唐晓玲、徐燕，分别为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旅游管理办公室主任、讲解员、职员